

逆水行舟：

体系如何辜负了人口贩卖幸存者

来自首个国家幸存者研究项目的调查结果

2023.01



Polaris Freedom
happens
now.

研究贡献者

核心研究团队

Sara Woldehanna (项目代表), Lara Powers (利益相关者参与负责人), Vanessa Bouché, Katherine T. Bright, Tristan Call, Michael Chen, Hazel Fasthorse, Tawana Bandy Fattah, La Toya Gix, Elizabeth Jacobs, Forrest Jacobs, Ashley Maha'a, Erin Marsh, Betsy Nolan, Namrita S. Singh, Karen Snyder, Kyle Vincent, Lauren Vollinger, Charity Watters

社区咨询小组

Wade Arvizu, Marlene Carson, Harold D'Souza, Hazel Fasthorse, Wang Fen, Eric Harris

其他贡献者

有关该研究的其他贡献者的列表，请参见第64页。

伦理保护

国家幸存者研究已获得**纽约生物医学研究联盟（BRANY）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伦理批准。该研究还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获得了**保密证书（CoC）**，该证书通过禁止向与研究团队无关的任何人披露可识别的敏感信息来保护研究参与者的隐私。



资助方

国家幸存者研究项目由以下组织以及支持我们所有工作的慷慨且有爱心的人士促成。



致谢

本报告的设计和撰写主要归功于 Sabrina Thulander 和 Caren Benjamin，他们与研究团队合作，忠实地传达了调查结果。

此外，我们要特别感谢 Sara Crowe，她领导了与人口贩卖幸存者在贩卖期间和之后的财务经历相关的数据的开展和分析。

感谢我们的利益攸关方合作伙伴参与我们的调查，这帮助我们考虑周到的反贩卖专业人士那里获得关于各种研究主题对其工作和整个反贩卖领域的重要性的关键见解。

特别感谢Polaris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项目主管，他们参与访谈、需求评估、调查，以及关于各种研究主题的演示、反馈和方向指引，对国家幸存者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感谢我们慷慨的资助方：PayPal、United Way、Match Group 及IHG。如果没有它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完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感谢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的幸存者们，从深入了解国家幸存者研究的信息会议到焦点小组、认知访谈和调查工作本身。我们对此深表感激。





目录

关键定义	7
执行摘要	8
引言	12
研究目标及框架	13
研究设计	14
过程	14
方法	14
伦理程序	15
限制	15
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摘要	18
遭受人口贩卖剥削的经历	18
研究结果概述：虽然活着，但很艰辛	19
存者的生计：新生后的就业和收入	20
家庭年收入	20
就业状况	20
助长虐待的薄弱环节	24
儿童的不良经历	24
参与完善青少年司法体系	26
与儿童保护服务机构（CPS）的互动	27
人口贩卖与脱离贩卖境况：体系辜负了幸存者	29
面向工作者的保护	29
支持回归常态：需求与不足	31
家庭法的失败	35
脱离贩卖境况：实现收入稳定的障碍	37
金融障碍	37
执法和犯罪记录的障碍	41
结论	43
附录	44
A: 受调查者的完整人口学概况	44
B: 性贩卖和劳工贩卖的调查定义	47
C: 不同幸存者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情况	49

表及配图

图1. 人口贩卖幸存者的可持续生计模型.....	13
图2. 受访者与普通美国人口的家庭年收入对比.....	20
图3. 当前就业状况.....	20
图4. 摆脱剥削境况后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受访者比例一览.....	21
图5. 您何时接触过青少年司法体系?.....	27
图6. 当您在不满 18 岁时, 是否曾有任何来自儿童福利体系的人因为关切您的福利二联系过您的主要监护人?.....	27
图7. 儿童福利体系是何时联系您的监护人?.....	28
图8. 劳工贩卖中的合同问题.....	29
图9. 遭受劳工贩卖期间的工作场所的情况问题.....	30
图10. 受访者摆脱贩卖时或当前的与就业有相关的需求占比一览.....	33
图11. 在遭受剥削之前、期间或之后是否有过子女?.....	35
图12. 人口贩卖中的金融滥用.....	37
图13. 受访者身份被贩卖者滥用的方式.....	38
图14. 目前没有银行账户的受访者与美国普通人口的情况对比.....	39
图15. 没有银行账户的常见原因 一无账户的受访者与无账户的美国普通人口对比.....	39
图16. 受访者与普通美国人口的过去12个月的金融经历对比.....	40
图17. 曾因卷入贩卖活动而被执法部门逮捕, 被拘留或传唤的时期.....	41
图18 犯罪记录与遭受贩卖的关系度.....	42
表 1 贩卖类型.....	18
表 2 年收入低于 25,000 美元的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21
表 3 年收入低于 25,000 美元的受访者对他人负有财务责任.....	22
表 4 童年时期的不良经历.....	25
表 5 与少年司法系统的互动.....	26
表 6 可用于劳工贩卖幸存者的申诉机制.....	30
表 7 摆脱贩卖境况后的十大需求.....	31
表 8 目前的十大需求.....	32
表 9 最有价值的支持来源.....	34
表 10 最有害的支持来源.....	34
表 11 与儿童有关的经历.....	35
表 12 儿童监护经历.....	36
表 13 执法经验.....	42



关键定义

人口贩卖：本研究使用了美国联邦对人口贩卖的定义，包括性贩卖和劳工贩卖（强迫劳动）。二者定义如下：

- 性贩卖是指招募、窝藏、运输、提供、获取、光顾或引诱某人进行商业性性行为，其中商业性性行为受暴力、欺诈或胁迫等方式诱导，或者被诱导进行此类行为的人未满18岁。
- 劳工贩卖是指通过使用暴力、欺诈或胁迫的方式招募、窝藏、运输、提供或获取某人的劳动或服务，以使其处于非自愿的奴役、劳役、债役等状态。¹

体系：构成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² 它们是“构成社会互动的既定和普遍的社会规则”的体系。³ 这些包括政策、法律，以及管制社会中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和互动的规范。

生计：本术语“包括人，及其能力和生活手段，包括食物、收入和资产。”⁴

组织：指“一个团体、协会或机构，是一种由公认的角色和职位组成的结构体，以某种关系安排起来以实现特定的目标。”⁵

机构：“制定和执行政策和立法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提供服务；购买、交易、以及其他各种影响生计的职能。”⁶

幸存者：在本项目中，幸存者一词指的是有人口贩卖受害者经历的个人。我们认识到，并非所有有生活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认知。

1 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 22 U.S.C. §7101 (200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PLAW-106publ386/pdf/PLAW-106publ386.pdf>.

2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808678

3 Hodgson, G. (2006). What are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40(1), 1-25. doi:10.1080/00213624.2006.11506879

4 Chambers, R., & Conway, C. (1992).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ds.ac.uk/publications/sustainable-rural-livelihoods-practical-concepts-forthe-21st-century/>

5 Christensen, I., & Pozarny, P. (2008). Socio-economic and livelihoods analysis in investment planning: Ke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o.org/3/bq859e/bq859e.pdf>

6 Serrat, O. (2017).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In *Knowledge solutions* (pp. 21-26). Springer, Singapore.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0-0983-9_5.

执行摘要

国家幸存者研究（NSS）是一项科学严谨的研究项目，旨在揭示人口贩卖幸存者的经历和需求，以便幸存者和社区能够设计有效的策略来打击人口贩卖。

在反贩卖领域进行高质量研究的必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所做的研究通常依赖于二手资料来源，包括通过国家人口贩卖热线创建的数据集。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以及解决方案的制定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虽然用经验证据填补这一空白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是国家幸存者研究的唯一目的。除了提高我们对人口贩卖的认知，该项目还引领了人口贩卖研究传统运作方式的巨大转变，即：从以往的收集特定社区数据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转变为与该社区合作设计研究项目。



除了提高我们对人口贩卖的理解之外，该项目还对人口贩运研究的传统运作方式进行了重大转变。

Polaris从2007年开始运作国家人口贩卖热线，并藉此建立了美国已知最大的人口贩卖数据集，之后就开始了“国家幸存者研究”项目。人口贩卖热线的数据在揭示美国最常见的人口贩卖类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信息是被动收集的。幸存者只会被问及一些必要的问题，以帮助他们寻求帮助。他们只分享自己需要分享的信息，因此不一定有机会进一步考虑哪些信息可能对其他人有帮助。此外，并非所有幸存者

都选择或甚至能够在遭受贩卖情况下联系热线。

虽然被动信息的收集不能充分利用幸存者掌握的信息，但它同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首先会询问幸存者对人口贩卖经验的哪些方面的研究最感兴趣。根据他们所分享的信息，**NSS旨在审查幸存者的经历和对影响他们实现积极生计成果能力的机构和组织的看法**。这是通过对美国的幸存者进行调查，并通过焦点小组和认知访谈等定性方法实现的。

以下是NSS调查部分的主要调查成果。未来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将更深入地研究幸存者报告的“动因”，使我们对那些经历过人口贩卖的人的经历的理解更有层次。



人口贩卖幸存者的生存境况并不好。

- 本应保护受害者（通常是在儿童时期）的体系辜负了他们，而且很彻底。
- 本应在人口贩卖期间保护受害者的制度失能了，包括刑事司法和法律体系。幸存者完全是靠自身的意志力从遭受贩卖的境况中挣脱出来的。
- 本应在人口贩卖后支持幸存者的体系正在失能。很少有人能真正获得服务，特别是心理健康和就业支持。他们需要治愈且很好地生活下去。幸存者被排除在能够让他们重新开始的主流金融体系之外，也往往会被剥夺子女的监护权。
- 或许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幸存者往往生活在贫困或接近贫困的境况之中。幸存者正在工作或试图寻求工作。有些人甚至同时做多份工作，但仍然是在艰难地维持着生计。



关于国家幸存者研究项目

- 国家幸存者研究获得了纽约生物医学研究联盟（BRANY）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批准。该研究还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获得了保密证书（CoC）。
- NSS调查是在线进行且自主管理的，受访者可以选择通过电话参与，并在NSS团队成员的帮助下参与调查。
- 形成性数据收集和调查均以英语、西班牙语或普通话提供。
- 457名幸存者回应了调查。
- 所有参与者付出的时间都得到了补偿。
- 参与者通过回答一系列符合性与劳工贩卖定义的问题来自我认定为幸存者（见附录 B）。

关键调查数据点



脱离贩卖境况后的收入与就业状况

衡量积极生计最简单的标准就是收入。按照这个标准，幸存者已经落后于其他人口了。

- 在受访者中，43%的人的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而美国普通人口的这一比例为26%。



贩卖的脆弱性

绝大多数人口贩卖幸存者在童年时期有过痛苦经历、虐待、贫困、精神健康问题等等。为了评估这些脆弱性与幸存者之间的联系，NSS采用了广泛使用的CDC-Kaiser永久童年期不良经历（ACE）问卷，以适应人口贩卖的背景。

在NSS，这些经验被分为六类。受访者报告说，他们都以惊人的比率经历过每种情况。

- 经历过贫困：83%
- 离家出走：69%
- 经历过的虐待（身体、性、情感）：96%
- 经历过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93%
- 曾与经历过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一起生活：93%
- 其他类型的家庭变故：96%



贩卖幸存者提供服务和支持

受访者们最经常反馈的希望得到却难以获得的资源，是希望能获得负担得起的且能够了解创伤的心理健康支持。

- 在脱离贩卖境况时，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自身的创伤需要获得行为或心理健康服务。在调查时，39%的受访者表示有同样的需求。
- 在脱离贩卖时，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的需求包括寻找值得信赖的个人及社区的支持，以及帮助找到一份稳定的、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
- 在调查时，收到的其他需求包括帮助偿还债务、修复信用评分和管理长期的健康影响等。



金融包容性和稳定性的障碍



性贩卖和劳工贩卖的幸存者在经济和社会包容方面面临着一些独特的障碍，这些障碍可能不会对其他类型暴力的幸存者产生类似的影响。

- 犯罪记录

大约 40% 的受访者报告了某种犯罪记录，其中 90% 的受访者报告说，他们全部或部分被捕与他们的剥削有关。犯罪记录可能会阻碍经济包容、受教育的机会或找到稳定的住所。
- 金融滥用/缺乏进入金融体系的机会

利用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其贩卖者滥用其身份进行各种金融规划。

 - 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遭受过贩卖者的经济虐待。
 - 受访者没有银行账户的可能性是美国普通人口的两倍。
 - 受访者申请发薪日贷款的可能性是美国普通人口的11倍。

展望

在贩卖前、贩卖期间和脱离贩卖后均失去效用的系统是有很多机会可以改进的。在某些情况下，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很多州正在制定或加强法律，以帮助幸存者澄清犯罪记录。一些有前瞻性的银行已经开始放弃开设账户或信用卡的某些要求，这使财务规划和服务更容易获得。然而，这些只是建立有利于幸存者的机构的第一步。NSS的调查结果幸存者及其盟友开始采取更大、更具影响力的措施，以改善美国的人口贩卖预防和应对工作提供了一个起点。NSS的调查结果幸存者及其支持者提供了一个起点，开始采取更大、更有影响力的步骤，改善美国的人口贩卖预防和应对工作。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终结人口贩卖的运动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在该领域仍然缺乏大量的高质量的研究和经验证据。现有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Polaris运作的美国国家人口贩卖热线，该热线产生了关于北美人口贩卖的最大数据集。然而，这些数据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并非所有受害者和幸存者都选择或能够联系人口贩卖热线；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往往处于危机状态，分享信息往往以获取服务为目的，而不是出于研究目的。此外，这种在数据收集中的被动角色扭曲了权力动态，使幸存者无法控制数据所呈现的事件或数据的用途。

因此，我们迫切希望得到更多的证据，不仅要填补这些数据空白、建立行之有效的项目和政策，而且要通过研究过程为幸存者赋能。对于有过人口贩卖生活经历的人，最能帮助其他人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反人口贩卖工作如何能开展得更好。尽管这听上去是显而易见的事，但迄今为止，研究如何更好地了解人口贩卖的依然是以那些拥有某些学术或专业证书的人士为主。



有过人口贩卖经历的人最有可能帮助其他人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反人口贩卖领域如何做得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选择主题，创建、提出问题，并从他们自身的视角来分析结果。而幸存者的角色往往被限定为被研究的对象，被要求分享他们当前生活中痛苦的记忆或个人的深刻感受，并且并不知道他们所分享的信息如何被解读和使用。

国家幸存者研究（NSS）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多阶段调查项目，试图让上述局面彻底改观，并提供一个新的反人口贩卖研究的早期例子——该研究会重视幸存者自身的参与，而不只是将其当成研究对象。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幸存者的主导力和既有知识将反映在过程的各个环节，从创建研究问题到进行参与者外展和促进焦点小组等等。即使是现在，在数据收集完毕后，幸存者的参与仍在继续，因为幸存者将成为研究团队的全面合作伙伴，以了解如何能够以及应当如何共享和利用这些信息来做出改变。

这一过程本身就是NSS的两个关键成果之一：如今，幸存者已经勾勒了一个包容性研究的蓝图，可以被其他组织和世界各地复制。另一个成果在于丰富的数据集本身，它提供了来自具有广泛经历和不同背景的幸存者的见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幸存者的指导下，我们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了解不同社区和不同人口统计群体之间的经历或观点如何不同。这些见解能够行之有效地成为针对受害者、幸存者和易受贩卖影响的人的支持措施的基石。



研究目标及框架

NSS试图了解幸存者对影响他们**生计的体系、机构和组织**的经历和看法。本研究的目的是：

- 了解**幸存者和与生计相关的体系和机构接触的经历**（例如，与就业、金融服务、刑事司法有关的体系和机构），包括各种规范、政策、规则和做法对他们谋生能力的影响。
- 描述**新资产及社区资产的非正式来源**，以及幸存者用以建立经济稳定的**弹性来源**。

探讨上述主题的目的是了解幸存者在**经历和观点**上的异同，方式包括考察种族、性别认同、性取向、残疾状况、年龄、移民状况、家庭状况（单亲、大家庭）、教育水平、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宗教、地区）以及人口贩卖类型等。

可持续生计方法⁷ 最初用于解释生计策略和环境背景，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状况，后来用于阐明本研究的范围和定义（见下图1）。生计框架有助于描述人们生计的复杂性，方式包括寻求理解各种维度以及相关的策略、机会和约束。⁸ 个人的脆弱性背景确定了该方法的框架，并在社会、机构和组织环境中获得某些资产或资源。⁹

图1. 人口贩卖幸存者的可持续生计模型



改编自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以性别、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地方知识为基础：培训手册。于2020年4月26日从<http://fao.org/3/y5956e/y5956e04.htm#ch2.1>检索而得。已获许可转载和改编。

7 Christensen, I., & Pozarny, P. (2008) .

8 Ellis, F. (2000) . *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Christensen, I., & Pozarny, P. (2008)

研究设计

过程

Polaris在2020年底开始设计该研究项目，并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了需求评估，确定适当且有用的主题的初始研究范围。需求评估的结果与关于美国现有的劳工贩卖和性贩卖知识的文献综述和空白分析相结合，这有助于确定如何最好地利用NSS来填补现有数据的空白。在回顾了社区参与研究模型之后，该团队为NSS开发了一个有意义的幸存者参与模型。更重要的是，这种参与模型是由我们研究团队中的幸存者引导和促进的。

接下来，根据这种接触模式，Polaris开展了两轮Delphi研究¹⁰，我们与不同的反贩卖领域的专业人士就NSS中应该调查的最关键和最相关的领域进行了对话。2021年3月至4月期间，有130多名反人口贩卖专业人士参与其中，第一轮66名，第二轮有134名；其中超过50%是幸存者。

NSS还在2021年5月成立了一个社区咨询小组（CAG），以吸引有过相关专业知识和生活经历的个人。CAG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展现出坚持社区参与的原则，以及对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承诺。该项目是由一个包括幸存者领袖在内的研究团队开发和实施的，CAG成员弥补了主要NSS研究团队中的人口统计和生活经历空白。

CAG成员参与了有意义的合作活动，以支持NSS。成员们有明确的角色和责任，在承诺加入小组之前确保透明度。CAG成员定期参加会议，以提供关于NSS的见解和反馈，包括研究设计和方案等。小组成员还为研究问题和工具的发展提供了信息，为研究参与者的推广和招募提供了针对特定人群的策略，对本研究收集的数据的分析提供了贡献和反馈，并提出了传播方面的建议。所有CAG成员的时间都得到了补偿。

面向可以参加调查的人进行推广也是一个参与性的过程，包括雇用幸存者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以尊重对方文化的方式接触特定社区。

方法

NSS结合了混合方法开展调查研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这种类型的方法最适合参与性的行动研究，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让社区参与研究的迭代设计、实施和分析。在本研究的不同阶段，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面向关键信息提供者的深入访谈、结构化调查和便利的小组讨论等。

该研究在不同的阶段实施，包括从2021年9月开始的用以确定合格性的筛选过程、两个主要的数据收集阶段，一个分析和感知建构阶段，以及最后的传播阶段。

这两个数据收集阶段分别是：

- **第一阶段：**形成性研究——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
- **第二阶段：**典型性调查——2022年3至8月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Polaris采用了在线小组讨论和关键信息提供者的针对性访谈。对形成阶段的结果进行分析，并以几个重要的方式纳入到第二阶段的发展中。首先，第一阶段被用于告知总体研究的设计和实施的进展。其次，第一阶段的活动为

10 Barrett, D., & Heale, R. (2020). What are Delphi studies? Evidence-Based Nursing, 23(3), 68-69. doi: 10.1136/ebnurs-2020-103303



我们的外展、招募和维系工作提供了信息，为我们的研究人群中缺少哪些对象，以及我们如何开发更多样化和更具包容性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指导。第三，第一阶段的结果对定义和确定影响生计的经济体系的范围提供了帮助。

研究的第二阶段主要是一项自我管理的在线调查，受访者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并在NSS团队成员的帮助下参与调查。调查参与者是自我认同的人口贩卖幸存者。鉴于参与过程较为简单，而且酬劳较为丰厚，该团队收到了数百个被调查平台标记为潜在的欺诈或重复的条目。而那些被多项指标所标记的受访者被要求核实他们在调查中提供的基本信息。NSS团队努力核实受访者是否是自然人，但并没有试图去核实任何人的过往生活经历。

用于调查的问题是在认知访谈的参与式过程中最终确定的，幸存者和相关研究团队成员在半结构化访谈中与研究参与者开展关键问题的问答，以核验可理解性、语言的适当性和相关性，并征求反馈和编辑意见。这有助于确保社区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在调查中问到的问题。

伦理程序

由于伦理方面的考量对所有涉及弱势群体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涉及人口贩卖幸存者的研究中，因此我们采取了特别措施，以确保在研究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不去复现遭受剥削的经历。该研究的所有阶段都在收集数据之前得到了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批准，确保在研究过程中保护自然人受访者。所有团队成员在参与数据收集或分析之前都完成了自然人受访者研究认证。我们遵循适用的伦理研究标准，包括知情同意、自愿参与、隐私和保密，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参与者面临的风险，并提供申诉机会和对参与经历的反馈，并对不当的诱导行为进行补偿。

在数据收集的两个阶段，所有幸存者参与者的时间都得到了补偿。参与研究定性部分的参与者，包括可能超过一个小时的小组讨论和深度访谈，可获得75美元的酬劳，所有预计持续30~45分钟的调查参与者均可获得40美元的酬劳。

通过确保潜在参与者能够获得有关研究的完整且透明的信息，包括研究的目的、我们使用和传播数据的意图，以及我们保护数据隐私的程序，我们优先确保知情同意。所有参与者都会被告知上述细节，他们的参与完全是自愿的，他们也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中止参与，且不会影响他们与Polaris的关系或者获得补偿的资格。研究获得的信息会存储在安全的平台上，只能由研究人员访问，所有的识别信息都与主要数据分开存储，仅用于为参与者发放酬劳。

理解披露创伤经历的过程中难免会触发情绪问题，如果不妥善管理，可能会导致不确定的状况，研究团队严格践行了各种安全协议，包括始终保证有一位幸存者顾问出席所有的小组会议，并在每次讨论后进行私密对话，并为参与者提供他们应当获取的当地资源，以及国家人口贩卖热线服务提供者目录。

最后，作为两个独立的机构，联合行动小组和伦理委员会听取了申诉、投诉，并就最适当的行动方针提出建议。

限制

NSS的目标是明确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们承认其调查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诸多原因，我们无法接触到所有我们希望接触到的社区。很多经历过贩卖的人都未曾与任何正式的幸存者社区取得过联系，因此很难通过传统的幸存者外展

方式来联系。此外，很多幸存者也可能只是因为某些其他原因而选择不参加调查。在NSS项目的形成阶段，很多报告都反映出了研究过程和反贩卖领域让他们有再次经受过创伤的经历，因此他们不相信这一过程，这也在情理之中。¹¹

另一方面，已经通过幸存者反贩卖专业人士的组织和网络与反贩卖领域建立联系的幸存者的参与比例相对过高。

基于我们的形成性研究和与幸存者参与者和团队成员的对话，我们在关于剥削经历的部分中包括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经历，以使调查覆盖大多数的参与者。然而，仍然有一些参与者没有看到他们所经历的贩卖类型被包含在内。

此外，我们的包容性标准是为了满足伦理委员会在美国提出的研究伦理标准，因此仅限于那些曾在美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剥削，且目前仍在美国生活的参与者。由于某些类型的劳工贩卖的性质，以及与临时签证的关系，有很多幸存者可能有资格参加，但在脱离贩卖境况后返回了本国。

为了确保参与过程的知情同意，我们还排除了目前居住在特定设施的人，如拘留所、监狱、辅助生活设施或其他接受监护的设施。他们的决定可由其他人代为做出；因此，一些残障人士和被监禁者在样本中的并未有充分的体现。此外，尽管我们发现，由于COVID-19，我们的数据收集方法都是通过电话和在线收集的，使一些有健康问题或有照顾责任的参与者更容易参与，但我们并没有积极寻找残疾幸存者或接受照料者。尽管如此，我们确实发现有大量的幸存者报告至少存在一种残障状况。

此外，虽然我们扩大了讲西班牙语和汉语普通话使用者的参与机会，并在我们的外展团队中加入了说这些语言的工作人员，但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建立在这些社区的信任，因此我们的大多数样本都是讲英语者。除了英语、西班牙语或普通话以外的语言使用者并不包括在内，这使得数据偏向于那些我们提供了语言支持的使用者的经历。通过与服务于这些非英语社区的组织的进一步合作，可以相应地改善我们的代表性。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其他一些针对难以触达的人口抽样较为困难的原因，我们的数据不能代表所有的贩卖幸存者，不应该用这些数据对所有幸存者进行概括。这些数据只代表了那些有机会且愿意参与其中的人。此外，这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提供关于在某些社区常会发生贩卖情况的数据，也不是为幸存者中贩卖类型盛行的情况提供数据。

¹¹ Polaris (2022). What is meaningful engagement in research for survivors of human trafficking? Retrieved from <https://polarisproject.org/national-survivor-study-findings-and-resources/>.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研究参与经历

- 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进行这次调查，让我表达自己的声音。当我被问到从未被人问过的正确问题时，我感觉自己的心声得到了倾听。当我在进行这项调查时，我意识到倾诉自身经历并告诉那些足够关心并了解的人的感觉有多么好。我既有被揭伤疤的感觉，也有获得疗愈的感觉。我很高兴我做到了。因为我们幸存者比任何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真相是怎样的。我祈祷我在这次调查中所说的话能帮助其他获救的幸存者和那些等待获救的人。对于那些没有幸存下来的人，我会在天堂见到你们的时候说：“我也是。”再次感谢您。
- 我很高兴能接触到这个调查并参与进来。了解贩卖，并了解如何找到共鸣者，并为自己发声，这对我的疗愈非常有益，我期待帮助别人照亮黑暗，因为那通常是一条孤独的路，我知道我很幸运，因为很多人没能有机会返回家园。我想针对一些问题做出回复，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希望以后可以。

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摘要

共有**457名人口贩卖幸存者**对最后的调查作出了回应，这是美国对幸存者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全国性调查。

NSS没有试图确定贩卖情况的普遍程度，包括评估被贩卖个体的比例或其人口概况。因此，下面的人口统计数据是关于研究参与者的汇总统计数据，而非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的估计数据，并为随后的发现提供了背景。

有几个数据点为理解是谁回应了调查提供了关键的背景。这些数据点表明，很多受访者来自不同的社区，包括有色人种、性别和性少数群体、残疾人和农村居民。由于文化或外展方面的局限，调查人口中有少数具有男性身份的幸存者、非美国出生的幸存者，以及只经历过劳工贩卖的人。以下数据点是调查人群的一般标识。对受访者的口口统计数据的完整描述详见附录A：

- 43%的人认同自己是有色人种。
- 86%的人认同自己是女性。
- 45%的人认同自己是性少数群体（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其他）。
- 85%的人表示自己出生在美国。

遭受人口贩卖剥削的经历

在调查样本中，91%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性贩卖，59%的人表示曾经历过劳工贩卖。这表明，有相当多的受访者同时经历过性贩卖和劳工贩卖。

在本报告中，将提供整个样本的数据，或性贩卖或劳工贩卖其中一种的数据。要了解调查如何将一种经历归类为性贩卖或劳工贩卖，请参见附录B。

表1. 贩卖类型

贩卖类型	
性贩卖	91%
劳工贩卖	59%
受访人数 (N) ¹²	457



37% 的受访者曾经历过家庭性贩卖。

¹² N 是回答相关问题的调查受访者总数。



研究结果概述：虽然活着，但很艰辛

总体而言，幸存者通过NSS分享的信息提供了摆脱人口贩卖境况后的生活现状。但也明显看到了希望，因为幸存者通过调查告诉我们的故事突出了我们在面对通往成功之路上的巨大社会障碍时的非凡韧性。这些回应也提供了一些改变这一现状的明确途径。

总的来说，美国人口贩卖的幸存者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活得很好。

有非常多的人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维持收支平衡。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很多层面和时期的努力都失败了。

那些本应该保护他们的体系辜负了他们，甚至是彻底辜负，往往是针对儿童。

在贩卖过程中保护他们的体系都失能了，包括刑事司法和法律体系。

在贩卖人口后，本应该支持他们的社会服务体系正在失能。很少有人能获得相关的服务——特别是心理健康和就业支持——他们需要疗愈和茁壮成长。

幸存者在尽力去融入主流经济，但仍然存在着特殊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被排除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以及他们因遭受过贩卖而直接导致有犯罪记录在案，对他们而言，这是不公平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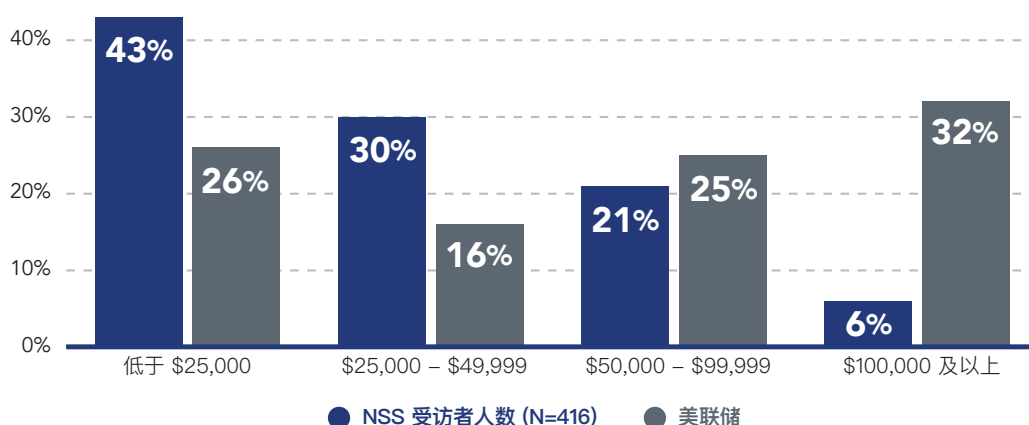
存者的生计：新生后的就业和收入

NSS的调查询问了有关收入、就业状况、雇主提供的福利、债务、储蓄以及获得银行和贷款等金融工具等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为了确定受访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食物和住所等基本需求，也为了确定存在境况稳定和得到改善的机会。

家庭年收入

该调查对积极谋生结果的最简单的衡量标准是收入。NSS的受访者绝大多数表示，尽管他们从事多份工作，但他们的薪水往往入不敷出。有近30%的人表示自己除了固定工作外，也做临时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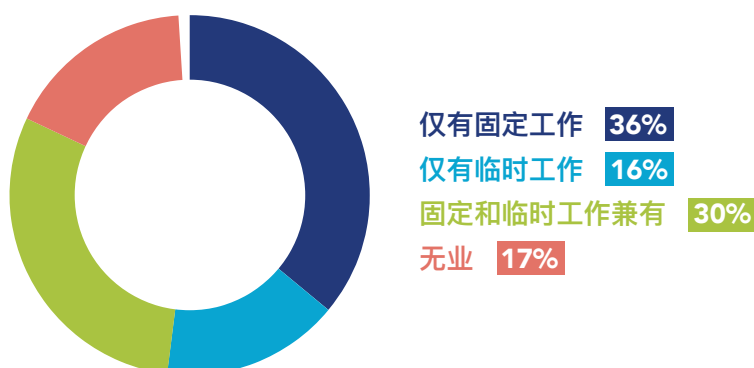
图2. 受访者与普通美国人口的家庭年收入对比¹³



就业状况

受访者报告了目前的各种就业状况。大多数人即使没有在做兼职工作，但至少有一份固定工作。

图3. 当前就业状况 (N=437)



13 United State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22).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 in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files/2021-report-economic-well-being-us-households-202205.pdf>.



然而，无论就业状况如何，受访者依然在努力维持着收支平衡。事实上，很多有固定工作或兼有固定和临时工作的受访者的年收入仍不到2.5万美元。无论在哪个州生活，2.5万美元的年收入都远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尤其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在美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在3.2万~3.5万美元之间。¹⁴ 在同一地区，有一名成人和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工资标准超过8万美元。¹⁵ 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工资为4.5万美元，一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的标准为11.4万美元。¹⁶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并不足以保证幸存者的生计。值得注意的是，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提供如医疗保健、基本残疾、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待遇。

表2

就业状况	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占比
有固定工作的受访者 (N=145)	30%
从事固定兼临时工作的受访者 (N=123)	31%
仅从事临时工作的受访者 (N=66)	53%

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得到能够提供福利的稳定工作，如医疗保健、基本残疾、保险、退休金等。



尽管已经摆脱贩卖境况很久的幸存者最终似乎会比受到更多剥削的受害者的境况稍好一些，但即使有了一份工作，幸存者的生活往往也很艰辛，不幸的是，这种轻微改善并不意味着这些幸存者成功建立了的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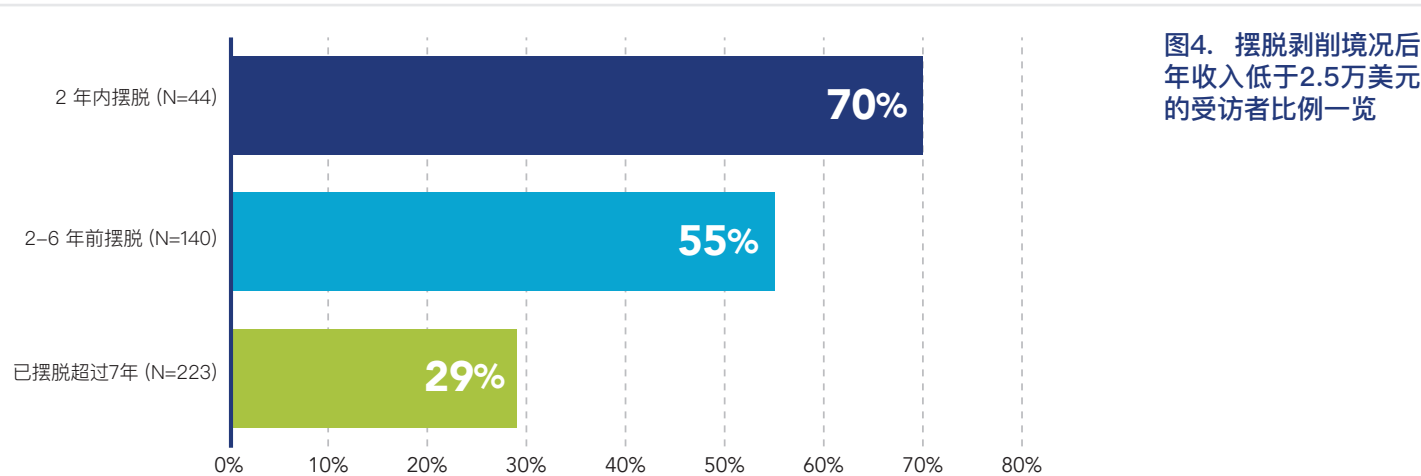


图4. 摆脱剥削境况后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受访者比例一览

14 Moser, S., & Swalina, C. (2004). *A Calculation of a Living Wa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livingwage.mit.edu/articles/99-a-calculation-of-the-living-wage>
15 同上。
16 同上。

在两年内摆脱遭受贩卖境况的受访者中，有70%的人的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虽然这一比率随着摆脱遭受贩卖时间的增加而下降，但在7年前退出人口贩卖的受访者中，有29%的人年收入仍低于2.5万美元。

这表明，对很多幸存者来说，他们的收入前景和生计前景并没有随着他们生活的继续而得到改善。由于贫穷是易受贩卖影响的一个指标，受访者在贩卖经历结束后依然生活在贫困中，这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当贩卖经历结束时，境况并不会彻底改观。受访者在最初的贩卖经历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都会境况堪忧。

最后，在需要养家糊口的受访者（即有家属的人）中，有43%的人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更多人来说，钱就更少了，不仅让幸存者自己，也使得其家属生活在贫困当中。

表3

在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幸存者中，年收入.....	
低于2.5万美元	43%
受访人数 (N)	211

收入和就业调查结果——选择组

本节介绍了调查人口中不同群体的收入和就业的选定调查结果。更完整的资料详见附录C。

- 对于性贩卖和劳工贩卖的幸存者，大约45%的受访者的收入都低于2.5万美元。
- 在自我认同为性少数群体的受访者中，50%的人表示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以及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受访者也表示，其收入低于2.5万美元，其比例超过50%。
- 没有一种种族、性别或性别认同类型的收入在5万美元至99999美元之间，其比例超过24%。
- 在表示有残障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人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
- 在表示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受访者中，有44%的人的收入低于2.5万美元。

这些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幸存者在摆脱人口贩卖境况后以及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面临着重大的生计挑战。无论他们摆脱后的时间长短或他们的种族、性别或性别认同类型如何，情况都是如此。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生计的结果

- 目前，在摆脱遭受剥削的境况后，我试图重新脚踏实地地生活。我几乎每天都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里跳舞，尽量多存些钱，这样我就可以追求其他的收入来源了。现在脱衣舞是我唯一谋生手段，而且我做得很好。很难轻言放弃。
- 一个月前我还算不错，但这个月我的工资很低，我得再找一份工作才能继续支付我的租金。
- 我破产了。
- 今年（摆脱受剥削10年后）是我工资增长丰厚的第一年，我不仅可以养家，还可以还清债务，开始有所积蓄了。
- 我的雇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扣掉了我所有的福利，并没有恢复这些福利，由于收入大幅下降，这对我来说压力很大，让我感到举步维艰，没有安全感（现在我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更少了）。我创办了一家机构，做得还不错，但由于是自主创业，我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办公地点。也很少有机构愿意在经济上或在他们自己固定的项目之外帮助幸存者。路漫漫，其修远，在心灵创伤的疗愈方面，永远也看不到彻底康复的那一天。

助长虐待的薄弱环节

人口贩卖并不是凭空发生的。正如这些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人口贩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数体系失败而最终导致的结果，这些体系本应保护人们免受虐待，尤其是儿童。这些失败是个别幸存者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源头，也是看待在维持积极生计/实现稳定收入方面所面临的困境的最主要的基准。

儿童的不良经历

从经济收入到健康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已经明确表明，儿童时期出现的一次或多2不良经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系列与生计相关的结果。¹⁷ 为了评估幸存者之间的这些关联，NSS采用了广泛使用的CDC-Kaiser永久童年期不良经历（ACE）问卷，以适应人口贩卖的背景。¹⁸

对于NSS，这种经历的定义如下：

- 至少在童年时期曾经历过贫困（食物、衣服、家庭等）
- 至少在童年时期经历过身体、性或情感虐待
- 至少在童年时期曾经历过离家出走
- 至少在童年期曾经历过滥用药物和/或患有精神疾病，包括酒精或非法药物或处方药
- 至少在童年时期与经历过药物滥用和/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一起生活过，包括酒精或非法药物或处方药
- 至少在童年期经历过其他家庭结构或看护人的变更

下方的表4中列举了受访者所报告过的童年经历的概况。

17 Smith, M. L., Herbert, A., Hughes, A., Northstone, K., & Howe, L. D. (2022). Socioeconomic position and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s risk factors for health-related behaviour change and employment adversit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sights from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the UK. *BMC Public Health*, 22(1),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2-14184-8>

Harter, C. L., & Harter, J. F. (2022). The link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financial security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43(4), 832-842. <https://doi.org/10.1007/s10834-021-09796-y>

Mosley-Johnson, E., Garacci, E., Wagner, N. et al. (2019).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United States Longitudinal Cohort 1995–2014.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8(4), 907–914. <https://doi.org/10.1007/s11136-018-2054-6>

18 Felitti, V. J., Anda, R. F., Nordenberg, D., et al. (1998).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4), 245-258. [https://doi.org/10.1016/S0749-3797\(98\)00017-8](https://doi.org/10.1016/S0749-3797(98)00017-8)



表4.

经历类型	接受调查的人口所经历的比例	N
贫困	83%	450
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食不果腹。*	72%	449
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没有干净的衣服穿。*	66%	447
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历过无家可归、居无定所或无法保障居住。	64%	442
虐待（身体、性、情感）	96%	450
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历过性虐待。	84%	438
在我小的时候，那些负责照顾我的成年人并没有给予我尊严和尊重。*	92%	445
在我小的时候，我和那些虐待我的人一起生活或在一起相处过。	80%	443
离家出走	69%	439
在我小的时候，我离家出走过，或是离开了我所居住的地方。	69%	439
与药物滥用或精神健康问题作斗争的人	93%	443
在我小的时候，我曾与药物滥用作斗争，包括酒精、非法药物或处方药。	62%	438
在我小的时候，我曾与抑郁症和/或其他精神疾病作斗争。	91%	435
与经历过药物滥用或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一起生活	93%	446
在我小时候，我曾和一个酗酒的或滥用非法或处方药问题的人一起生活或相处过。	77%	440
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个患有抑郁症和/或其他精神疾病的人一起生活。	85%	434
其他类型的家庭不稳定或变故	96%	451
在我小的时候，曾因父母离异、被遗弃或离世而失去监护人而受到影响。	70%	428
在我小的时候，我和那些对他人有过身体虐待行为的人一起生活或相处过。	76%	441
在我小的时候，没有人保护和照顾过我。*	83%	443
在我小的时候，我和一个进过监狱的人住在一起或相处过。	53%	440
在我小的时候，我和一个从事卖淫活动的人一起生活或相处过很久。	43%	430

*该问题被执行了反向编码，以呈现调查结果。（即，该问题被呈现给相反的受访者）

虽然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但也在意料之内。除了一个例外，受访者在NSS调查中衡量了超过50%的情况。显然，加强针对青年的预防工作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那些经常经历食物或住所危机、药物滥用或家庭不稳定的年轻人。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儿时的经历

- 我小时候遭受了贩卖，成年后，我所经历的一切没有得到帮助。我是在国内被贩卖的，但直到20年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一个家庭张贴了一个照顾孩子的广告，我的工作是一个驻家保姆，并获得有偿的食宿费用。预计每周为三个孩子工作40个小时，无偿工作。他们只允许我每周洗澡两次，诸如此类。我希望在外面找一份工作来填饱肚子之类。由于我小时候经历过被性贩卖的事情，以至于我没有意识到我成年后再次受到了剥削。
- 我16岁时因酒后驾车入狱。染上了酒瘾。因此，在我接受强制戒酒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介绍我吸毒的人，造成了我强烈的吸毒成瘾。

对弱势的年轻群体进行干预的共同点在于青少年司法体系或儿童福利体系。为了了解幸存者是否曾经接触过这些干预点，并验证其有效性，NSS询问幸存者是否曾与这两种体系进行过互动。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参与完善青少年司法体系

在有关幸存者参与青少年司法体系的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错失的机会。

在调查样本中，22%的人表示曾有过接触青少年司法体系的经历，56%的人表示这些经历发生在遭受剥削期间。这表明，青少年司法体系可能是他们被剥削的一个源头，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非但没有得到照顾和儿童福利服务，而是被逮捕并送进了少年管教所。

表5

你是否曾经接触过美国的少年司法体系？	
是	22%
否	78%
受访人数 (N)	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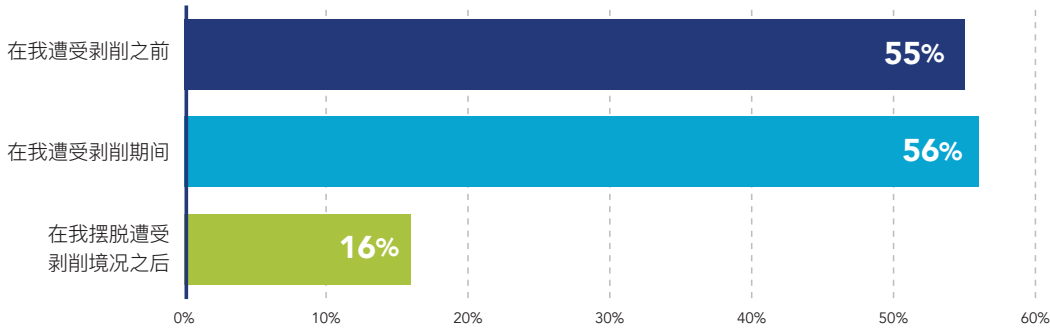


图5. 您何时接触过青少年司法体系? (N=94)

与儿童保护服务机构 (CPS) 的互动

同样，数据显示，本应是保护性的儿童福利体系，却未能保护很大一部分幸存者的安全。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在18岁以下时接触过儿童福利体系。另有20%的人表示，虽然从未接触过，但应该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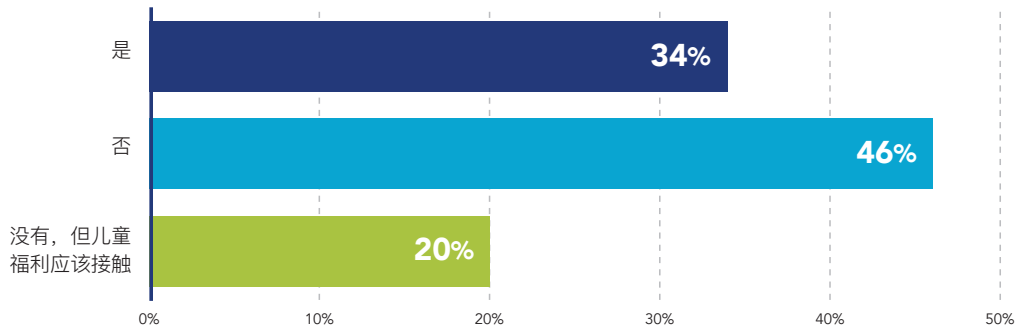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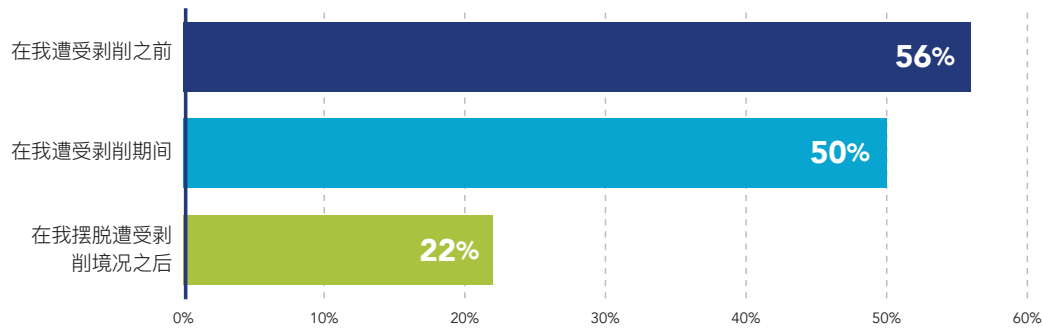


图6. 当您在不满 18 岁时，是否曾有任何来自儿童福利体系的人因为关切您的福利而联系过您的主要监护人? (N=413)

这一反应表明，与儿童福利体系的接触不仅是幸存者的共同经历，而且儿童福利体系也没有发现很多更弱势的儿童。图7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图7显示，曾在18岁以下接触过儿童福利的受访者经常报告说，他们直到已经开始遭受剥削或摆脱剥削后，才与儿童福利服务机构产生过接触。这些发现表明，CPS的干预往往来得太迟，或者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图7. 儿童福利体系是何时联系您的监护人? (N=131)



总的来说，本节的数据清楚地表明，调查样本中的幸存者在其青年时期面临着相当大的弱势。很多这些漏洞要么没有被可能帮助到他们的体系察觉，要么是被解决得太晚，无法提供帮助。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青少年司法体系和儿童福利体系

- 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犯罪。他们只关心惩罚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就会知道我家里有过的虐待经历。结果，我遭遇了劳工贩卖，并被我的母亲安排接受性剥削。青少年司法体系，你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正义！！
- 我在缓刑期间以及参与监狱体系和执法部门的经历真的很糟糕。我的意思是，他们最终既没有起诉我们的毒贩，也不相信我，把我当作一个离家出走的人，把我当个坏孩子一样对待，而不顾我父亲是个吸毒者的事实，这就是我离开家的原因。很明显，我在逃学，在逃避现实，最终惹上了麻烦，而这些却没人理会。
- 当时，儿童福利体系的人确实让我搬到了别处生活，但我的父母在利用我的继父做了“稳定的父母”后，又把我接回到了他们身边。回到家后，我一直在经历虐待，直到我17岁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就遇到了贩卖我的人。



人口贩卖与脱离贩卖境况： 体系辜负了幸存者

从法律结构和政策到组成社会安全网的体系，一系列体系的可用性和有效性，对幸存者在其遭遇贩卖期间和摆脱之后的境况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NSS的调查显示，很多机构都在辜负幸存者，无论是在遭遇人口贩卖期间还是在摆脱之后。这些失败为那些致力于重生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幸存者造成了重大障碍。

在审查这些失能时，NSS的重点是：

- 对工作者的保护
- 人在摆脱贩卖境况后的需求
- 人在接受调查时的需求
- 有过与家庭相关的审判体系的经历

面向工作者的保护

本节的调查结果特别涉及到那些报告经历过劳工贩卖的受访者（N=245）。美国存在的劳工贩卖本身就是劳动法执行失败的一个标志。在调查过程中，NSS特别关注了幸存者报告的不同类型的劳工贩卖经历，包括合同问题、工作条件和对申诉机制的了解程度。

在那些报告经历过劳工贩卖的人中，最常见的剥削形式是被骗去从事与先前承诺不符的工作，他们的劳动所得很少或根本不会有报酬。很大一部分受访者还报告曾被克扣工资或付款，或遭受过债务奴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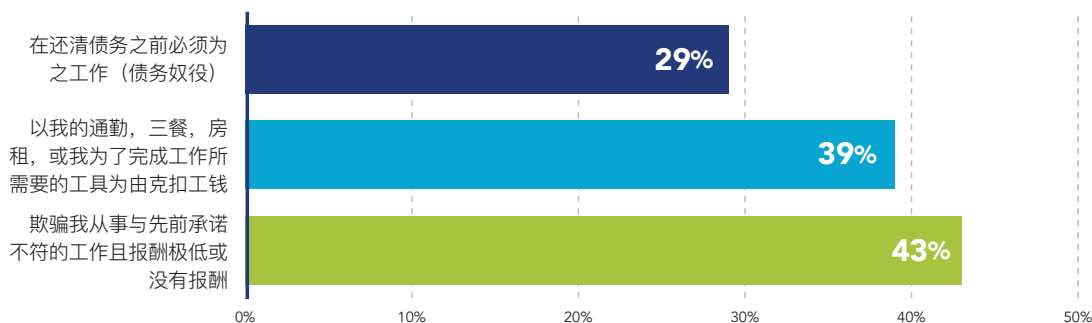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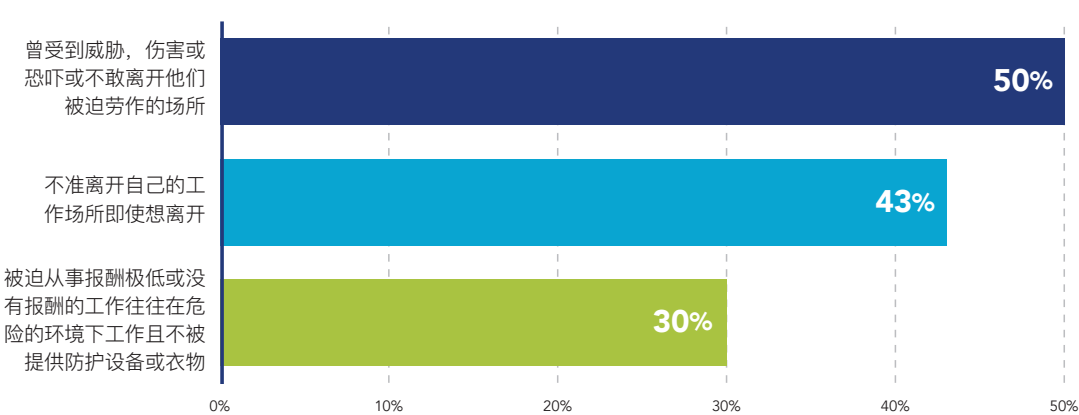


图8. 劳工贩卖中的合同问题 (N=235)

当被问及在劳工贩卖期间的工作场所的情况时，大约有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工作时受到威胁、伤害或恐吓，或是不敢离开被迫工作的地方。有超过40%的人表示，他们不能离开工作场所，即使他们想离开。

图9. 遭受劳工贩卖期间的工作场所的情况问题 (N=235)



很少有经历过劳工贩卖的幸存者知道他们可以联系谁来投诉他们在被贩卖时的工作条件、主管人员或其他方面。另外也有保密方面的担心，因为很少有工人知道如何进行匿名投诉。也许最重要的是，在那些经历过强迫劳动的人中，只有11%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一次检查员或外联工作人员访问过他们的工作场所。在那些经历过强迫劳工贩卖的人中：

表 6

劳工贩卖幸存者可用的申诉机制	是	N
知道要联系谁来投诉工作条件的受访者百分比	20%	184
知道可以向除主管上司以外的人反映与工作相关的问题的受访者百分比	17%	174
能够设法匿名投诉雇主的受访者百分比	11%	176
曾表示有政府的检查员或外联人员至少来过自己的工作场所一次的受访者百分比	11%	172

这些调查清楚地显示了各种虐待实例。受访者不仅被欺骗或威胁去从事他们不理解或与承诺不同的工作，通常报酬极低或没有报酬，而且他们也不能投诉这种虐待行为，即使他们想投诉。这表明，全国各地针对劳工情况的检查工作严重不足，使得劳工贩卖得以肆意猖獗。更糟糕的是，它剥夺了劳工贩卖幸存者得到他们有权得到的支持。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工作者的保护

- 他们付给我们工资，却要克扣给我们的所有服务，还让我们长时间工作。
- 实际上，身为移民，有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于是被人羞辱，使他成为受害者。

支持回归常态：需求与不足

每个幸存者的需求都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的人口贩卖经历。需求也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的需求，以及目前的服务是否提供了充分的支持，NSS询问了受访者在摆脱贩卖境况时和接受调查时的独特需求，以及他们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的经历。调查中所涵盖的需求是通过研究的形成阶段确定的，其中包括个人访谈和小组访谈。

表7

摆脱贩卖境况后的十大需求 (N=457)	
通过了解我的创伤的服务提供者获得行为或心理健康服务	75%
找到可以信任且能关心和帮助我的人	73%
找到一个安身之所	70%
找一份稳定且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	69%
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68%
进入一个健康且有支持性的社区	66%
获得高质量的、了解创伤医疗服务	65%
修复与安全的朋友或家人的关系	62%
面对那些因为我的遭受剥削或羞辱的经历而指责我的人	60%
接受教育或职业培训	60%

表8

目前的十大需求 (N=457)	
通过了解我的创伤的服务提供者获得行为或心理健康服务	39%
获得高质量的了解创伤医疗服务	34%
偿还债务	34%
找到可以信任且能关心和帮助我的人	32%
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32%
建立或修复信用	31%
管理慢性或长期的健康问题	30%
获得替代疗法（艺术、音乐、针灸、动物疗法等）	30%
进入一个健康的且有支持性的社区	29%
面对那些因为我的遭受剥削或羞辱的经历而指责我的人	28%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在摆脱贩卖后和当前最需要的是获得了解创伤的行为和心理健康服务。他们在摆脱后以及摆脱后很长时间都出现的其他需求包括：找到一个健康的且有支持性的社区，以及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两者也有一些差异。而受访者更多地表示，他们目前的需求偏向于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偿还债务或修复信用相关。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需要的援助类型与产生可持续的收入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



据报告，受访者在摆脱剥削时和当前都最需要获得了解创伤的行为和心理健康服务。

在收到的与建立可持续生计有关的需求中，对于成功的长期成果而言，最关键的一点是维持就业。很多受访者在摆脱贩卖境况时，需要与就业相关的支持。具体需求包括获得就业、接受教育或职业培训，或在摆脱贩卖境况时能够获得学习基本生活技能的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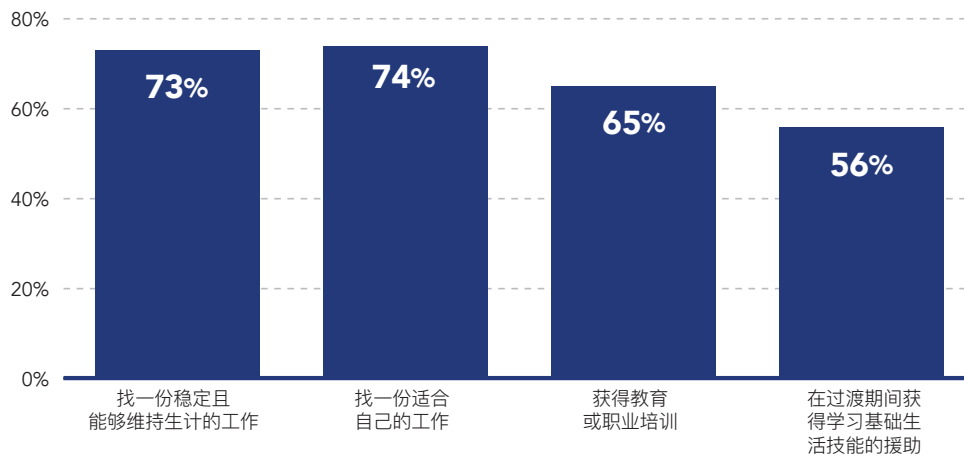


图10. 受访者摆脱贩卖时或当前的与就业有相关的需求占比一览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摆脱贩卖境况后的需求

- 我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因为我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我很难解释我的简历上的空白，那是因为我的心理健康问题和为了养活自己而做了非正式的工作。



除了需求，NSS还探索了幸存者用于摆脱或从其受剥削境况中恢复的工具。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了解幸存者知道、使用和发现有用的工具，以及有哪些服务领域可以改进。另外，它也彻底驳斥了识别和“拯救”成年的人口贩卖幸存者是一项有价值的策略的观点，因为绝大多数幸存者都表示，他们在没有执法部门或任何可能被视为救援力量的帮助的情况下脱离了贩卖境况。事实上，调查中报告的最有价值的支持来源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咨询、以及治疗，以及与其他幸存者的关系。

表9

最有价值的支持来源		N
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54%	445
咨询/治疗	48%	446
其他经历过类似剥削的幸存者，他们也知道我也经历了什么	42%	450
爱好（音乐、艺术等）	40%	448
来自支持者的支持	37%	446
支持小组	32%	446
来自非明确基于信仰的服务提供者/非营利组织的帮助	31%	448
来自基于信仰的服务提供者/非营利组织的帮助	30%	447
某个信仰团体（教会、清真寺、寺庙、犹太教堂等）。	28%	447
朋友（包括选定的家庭）	28%	447

表10

最有害处的支持来源		N
亲密的伴侣	19%	445
家庭	19%	445
某个信仰团体（教会、清真寺、寺庙、犹太教堂等）。	11%	447
来自基于信仰的服务提供者/非营利组织的帮助	6%	447
我的雇主/我的工作	5%	445
互联网，社交媒体，群发邮件	4%	448
朋友（包括选定的家庭）	4%	447
来自某个政府机构的支持	4%	446
来自非明确基于信仰的服务提供者/非营利组织的帮助	3%	448
其他经历过类似剥削的幸存者，他们也知道我也经历了什么	3%	450

这里的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虽然一些幸存者认为服务提供者、支持者或其他支持团体是有价值的，但他们更有可能依赖于自己或其他幸存者。这可能表明他们对可以提供支持的机构和体系缺乏信任，或者幸存者不知道他们可以获得何种支持服务。



受访者表示，他们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是他们摆脱剥削和重建生活的最有价值的资源。

在有价值 and 有害处的表中都可以看到一些支持来源，例如来自基于信仰和非基于信仰的组织的支持。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关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刚摆脱人口贩卖境况不久的幸存者可能比摆脱了很久了的幸存者获得更高质量的关照。其他原因可能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污名化程度会发生变化，这反映在任何基于信仰或非信仰的组织可能提供的关照服务中。

总的来说，本节的调查结果显示了两个主要的失败：未能有效执行劳动法和防止劳工贩卖，以及相关的支持体系未能为幸存者提供他们最需要的资源。从医疗保健到就业到金融服务，这些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很少有幸存者能够获得适当类型和水平的支持，进而实现积极的生计。在很大程度上，幸存者是全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感觉是这样。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摆脱困境的资源

- 我想到了基于信仰的组织，我决定称它有害，就像虐待关系那样。虽然可能带来一定的帮助。但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
- 我没有得到帮助，也不认识其他幸存者——直到最近我才见过其他的家庭贩卖幸存者。我一直以为受害者只有我一人。
- 我没有任何人来帮助我。我不知道如何联系或找到人来支持我。我很多年来都没有接受过疗愈或救助，也没有获得过医疗保健资源。这对我造成了精神伤害。
- 遇见了另一个幸存者，并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起了个名字——无价。

家庭法的失败

据报道，幸存者面临的一个更具破坏性和令人沮丧的体系性失败在于，当他们试图通过获得或重新获得心爱的子女的监护权来重建自己的生活时，家庭法庭体系常常会辜负他们。数据显示，人们对于家庭法庭体系内贩卖的情况严重缺乏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超过35%的有子女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孩子曾与剥削他们的人在一起。

表11

与孩子的经历	是	N
你是否有或曾经有过任何子女？	62%	420
对于为人父母的人来说，孩子是否和剥削你的人在一起？	35%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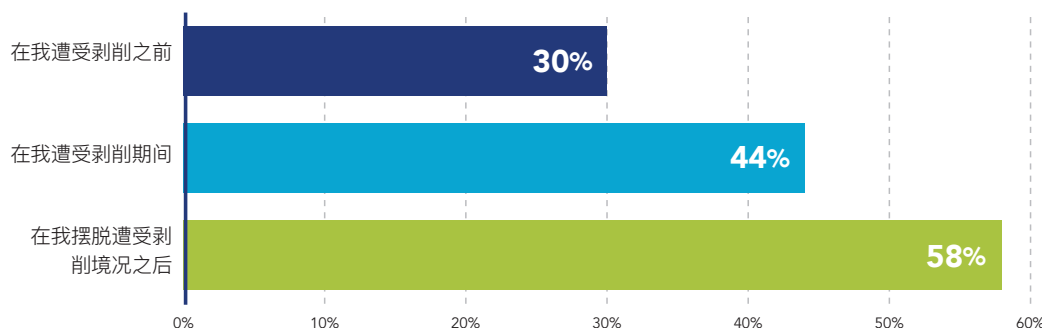


图11. 在遭受剥削之前、期间或之后是否有过子女？(N=255)

在那些有子女的人中，很多受访者报告说，他们曾经受到过对子女的监护权的威胁，包括国家或其他人，也包括那些剥削他们的人。

表 12.

儿童监护经历	Yes	N
对于那些有孩子的人来说，国家是否在某个时候将要（或威胁将要）剥夺您对子女的监护权？	31%	257
身为父母，您是否与本国以外的人有过关于孩子的监护权纠纷？	36%	253
对于那些争夺过监护权的人来说，你是否未能从本家以外的人那里成功争夺子女的监护权？	51%	90
对于那些争夺过监护权的人，您是否和您的剥削者有过监护权纠纷？	30%	89
对于那些与剥削者争夺监护权的人，您的监护权是否被剥削者剥夺了？	62%	26

显然，帮助家庭法庭利益攸关方更好地了解人口贩卖的现实是很有必要的。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儿童监护权

- 总的来说，家庭法庭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CPS）并不了解人口贩卖如何影响幸存者获得和保持子女监护权的经历，特别是当父母另一方就是贩卖者时。



脱离贩卖境况：实现收入稳定的障碍

在摆脱人口贩卖境况后，幸存者仍然面临着被社会和经济体系接纳的重大障碍，从而导致或构成积极的生计的结果。在研究的访谈期和形成期，幸存者发现的最普遍、最显著的障碍是：

- 无法进入主流金融体系，这让他们被迫受到发薪日贷款机构等昂贵的选择的支配。
- 很多幸存者因遭受贩卖而留下了犯罪记录，这使得他们更难找到工作或住房、接受教育或重建自己的生活。

金融障碍

进入主流金融体系——贷款、信贷、银行账户等——可能是影响幸存者生计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任何生活贫困或面临重大财政困难的人来说，这种获取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但也有针对人口贩卖的特定因素使参与传统金融服务更加具有挑战性。

遭受人口贩卖期间的金融滥用

大多数受访者都报告了剥削者的金融滥用行为。在本研究中，金融滥用包括出于金融目的而滥用个人身份识别，如申请政府补助、申请贷款、申请信用卡、开立银行账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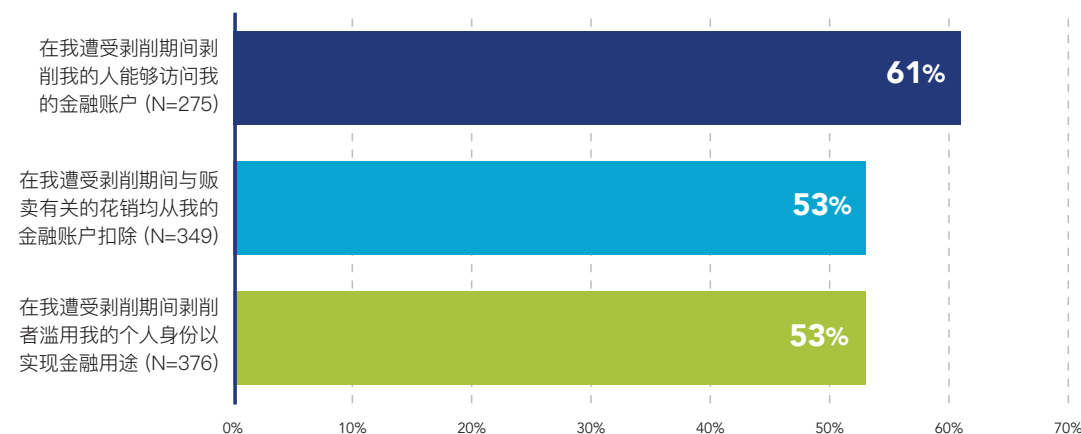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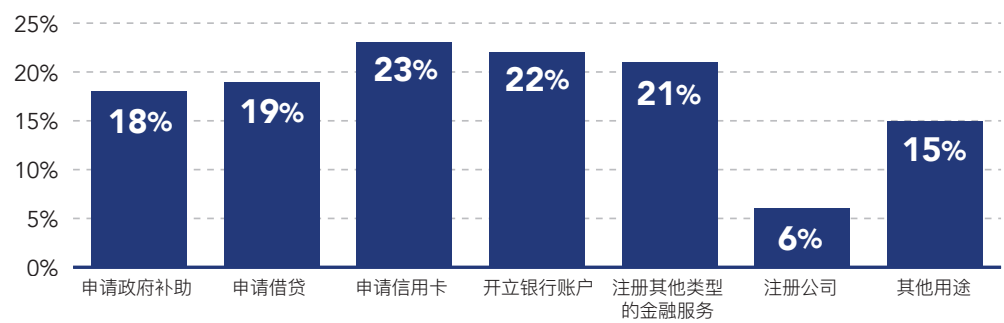


图12. 人口贩卖中的金融滥用

贩卖者滥用身份是贩卖过程中一种特别严重的金融滥用形式。由于身份被滥用，幸存者的信用评分和报告——获得贷款或信用卡等金融工具的能力——在退出剥削后受到严重抑制。图13中详细说明了受访者口中的身份被贩卖者滥用的最常见的几种方式。

图13. 受访者身份被贩卖者滥用的方式 (N=376)



不出所料，这种金融滥用的类型及程度会导致信用不良。在摆脱遭受贩卖的境况后，受访者表示，帮助修复他们的信用是他们最大的金融需求。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信用问题

- 由于我的信用记录，我的整个生活都崩溃了，我什么事都无能为力。
- 除了和我的剥削者共同签名或共同开立的账户外，我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信用、租赁权等金融手段，一切都是共同的。
- 我是一个单身妈妈，有两个孩子，二月份还会有一个孩子。我最近遭遇了袭击，这导致了意外怀孕。贩卖我的人用我的社保卡号和身份证开立信用卡并支付电话账单等，并用我的身份收款；要摆脱债务是不可能的。他们还威胁我和我的孩子们，从我们身上榨干一切，并且不断地剥削着我们。我们苦苦挣扎着。我在做心理咨询和培训，努力去成长和学习。我们在金融方面一团糟。国家援助仍然不足以让我们平衡物价的上涨。如果逼不得已，我会去粮食调剂处，甚至在街上乞讨。



访问银行账户

受访者强烈强调，在开立银行账户方面需要援助。如果没有银行账户，幸存者就只有低效和极其昂贵的途径可选，比如发薪日贷款等。与美国普通人口相比，受访者没有银行账户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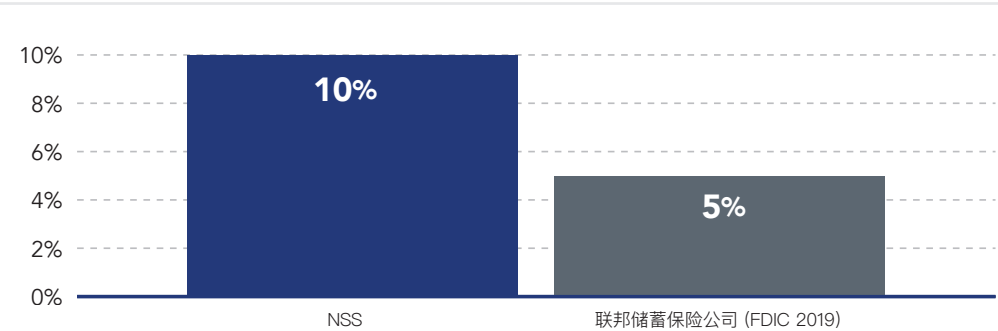


图14. 目前没有银行账户的受访者与美国普通人口的情况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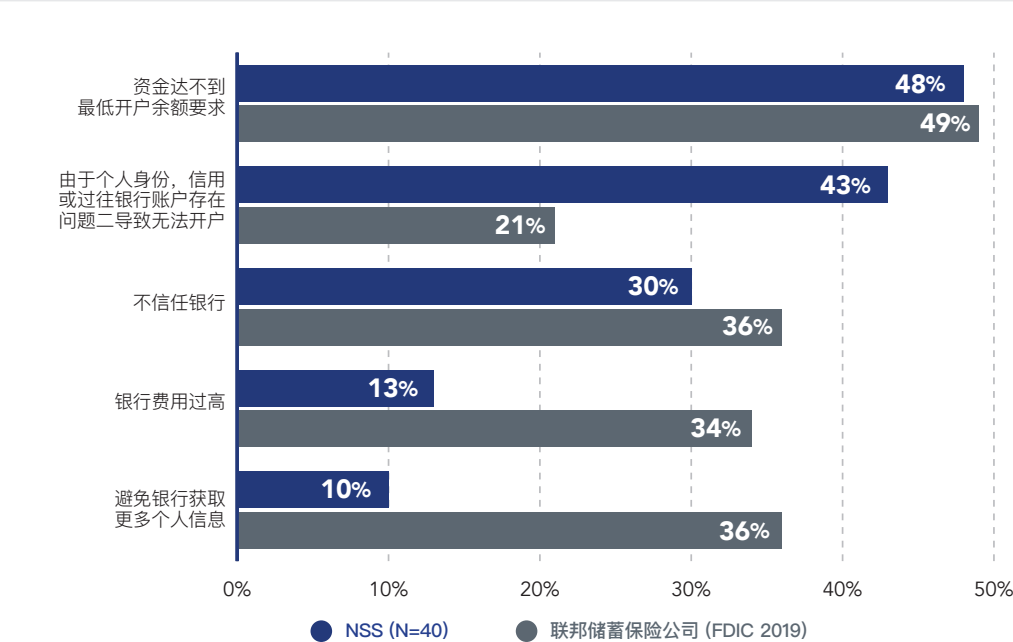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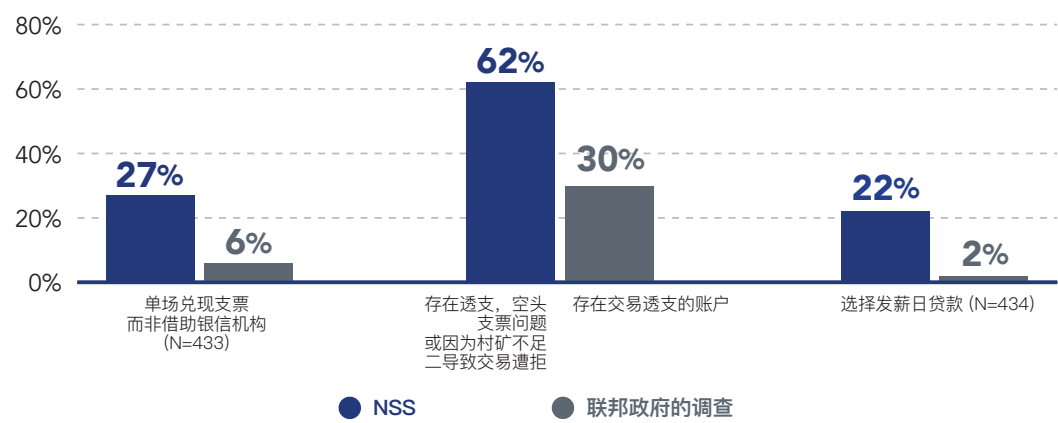


图15. 没有银行账户的常见原因——无账户的受访者与无账户的美国普通人口对比

当被问及没有银行账户的原因时，受访者认为，他们无法满足最低余额要求，这一点和没有银行账户的普通美国人口相似。然而，幸存者没有银行账户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由于身份证件、信用或过往的银行账户存在问题，导致无法开立账户，这些与其遭受贩卖的经历直接相关。

对于那些有银行账户的人，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由于资金不足而导致透支或拖欠支票或交易延期。调查显示银行通过建立特殊关照来支持幸存者应对面临的独特挑战的重要性。这可能包括提供不收取透支费和罚款的银行账户。

图16. 受访者与普通美国人口的过去12个月的金融经历对比^{19,20}



由于很多受访者没有银行账户或在某个时期难以获得银行账户，NSS也调查了非银行便利的金融活动。调查发现，幸存者采取发薪日贷款的比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倍以上（图16）。使用非银行贷款机构，如发薪日贷款和汽车所有权贷款等，比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互动更有可能导致债务循环。²¹ 发薪日贷款的年利率通常高达400%，并导致银行罚款费用、破产、拖欠其他账单和银行账户关闭的可能性增加。²²

虽然金融滥用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些原因，但其他问题则是和与收入相关的资源获取问题。例如，幸存者无法申请有最低收入要求的贷款，纯粹因为收入不够。收入与其他非财政问题密切相关，如教育资源和技能的获取，而再加上金融方面的障碍，使得幸存者实现积极生计结果变得更加困难。

总的来说，调查结果显示了贩卖所带来的严重且持久的后果，以及幸存者在摆脱贩卖境况后长期持续面临的障碍。相关体系已经采取行动来修复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比如2021年的债役修复法案，旨在帮助幸存者修复他们的信用评分。但在支持幸存者的金融成果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9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2020). How America Banks: Household Use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dic.gov/analysis/household-survey/2019/index.html>
20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2014). Data Point: Checking Account Overdraft. Retrieved from https://files.consumerfinance.gov/f/201407_cfpb_report_data-point_overdrafts.pdf
21 Haughn, R. (2022). Payday loan statistics. Bankrate. <https://www.bankrate.com/loans/personal-loans/payday-loan-statistics/>
22 Stop the Debt Trap. What is Payday Lending? <https://stopthedebttrap.org/about/whatispaydaylending/>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与金融体系的互动

- 我的银行账户存在很多欺诈行为记录，有一段时间我由于自己的银行账户而被列入了黑名单。当我摆脱剥削境况时，我的祖母不得不在她的银行为我担保，并共同拥有该账户多年，直到我能够证明我可以自己拥有这个账户。在遭受剥削多年后，我的账户仍然经常出现欺诈行为记录，我一直想知道它是否与我的社保号或暗网中的名字有关，因为我的丈夫和家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和欺诈有关的问题。
- 我的借记卡经常被用来用我的名字在酒店订房间。我的皮条客/贩卖者会把我通过Cash App把赚来的钱打给我。我订房间时用的是一个带有真名的假身份证用借记卡。（因为酒店要求需年满21岁，而我只有19岁，所以他给了我一张假身份证）。而他以我的名义行事，以保持他的隐私，防止在酒店发生任何潜在的执法情况。

执法和犯罪记录的障碍

与执法部门的接触往往是很多人口贩卖幸存者的第一次机构互动。无论是作为青少年、遭受人口贩卖前还是摆脱贩卖境况后，执法部门和司法体系在很多幸存者的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62%的受访者曾被执法部门逮捕、被拘留或传讯。其中有80%的人表示是在他们遭受贩卖期间发生的。

逮捕对幸存者的影响既是情感上的挑战，也是后勤上的挑战。在那些被逮捕、拘留或传讯的人中，有71%的人因此而留有犯罪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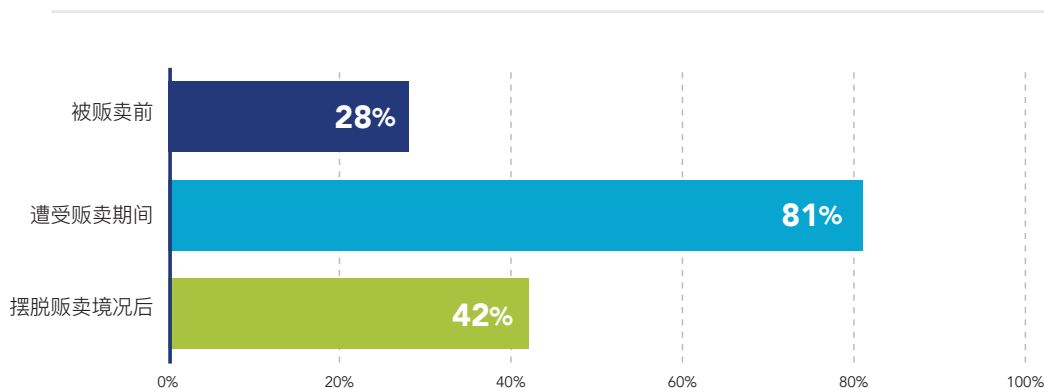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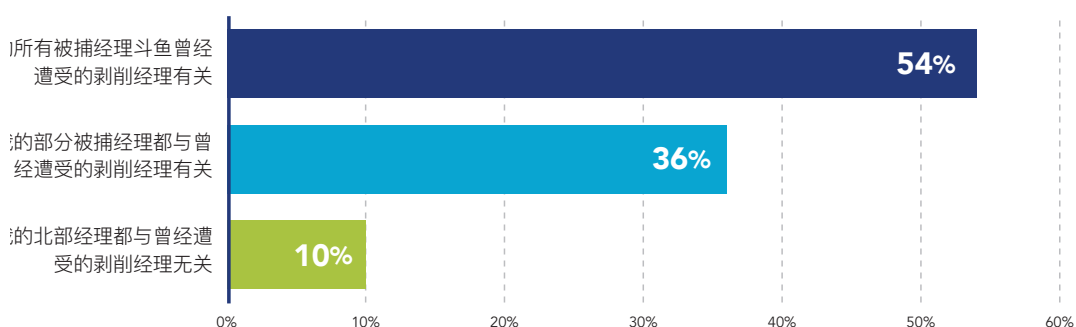
图17. 曾因卷入贩卖活动而被执法部门逮捕，被拘留或传唤的时期 (N=270)

表13

	Percent of respondents	N
曾至少被执法部门传讯、逮捕或拘留一次	62%	439
那些被传讯、逮捕或拘留的人，是否曾有犯罪记录	71%	244
除了完整样本外，是否存在犯罪记录	42%	413

在那些有犯罪记录的人中，90%的人报表示他们部分或所有的犯罪记录都与他们的剥削直接相关。

图18 犯罪记录与遭受贩卖的关系度 (N=163)



有犯罪记录的幸存者比例如此之高，这表明，即使在某一幸存者的环境或社区中存在充分的支助服务，他们也可能因为自身的记录而无法获得这些服务。



幸存者专家如是说：

刑事司法体系

- 我和那个剥削我的人一起被判在州立监狱关押了五年。此外，当我被捕时，我被单独关在一个牢房里很久。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帮助或相关资源。在上诉期间，因为我为了自身安全而拒绝表态，所以我被送进了监狱，并在那里关了两年。我在被判刑前从未被释放过。我的记录也没有资格获得消免，因为我的定罪被列为暴力重罪。
- 当你有犯罪记录的时候，就有很多你无法得到的需求。它让你更难获得就业机会，更难获得容身之所，更难获得服务。它影响了一切。



结论

NSSI收集到的信息描绘了一幅并不乐观的画面，即使不是特别令人惊讶。可悲的是，自2000年通过《人口贩卖和暴力受害者保护法》后二十多年以来，该法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邦人口贩卖法，在实际改善幸存者生活方面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

虽然这项调查数据不能被视为评估贩卖流行率的工具，但它确实体现了广泛的贩卖幸存者的情况，特别是与生计和收入稳定相关。

简而言之，本应防止人口贩卖或为幸存者提供支持的现有体系彻底没有发挥作用。**幸存者几乎在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实现金融稳定的障碍。**

这些障碍从缺乏获得银行账户和信用卡等基本金融工具的能力，到摆脱受剥削境况后难以获得一份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以及威胁要带走子女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阻碍幸存者取得积极的结果。

在遭受贩卖前、遭受贩卖期间以及退出贩卖境况后都没能发挥作用的体系有很多机会可以改进。政府政策、刑事司法和法律体系、服务提供者和金融机构的行动方都可以加大力度，确保这些体系不再辜负那些受害者、幸存者和易遭受贩卖的人。事实上，他们需要加大力度，以便更有效地防止人口贩卖的发生，使现有的幸存者能够获得支持，并帮助他们重建生活。

在遭受贩卖前、遭受贩卖期间以及退出贩卖境况后都没能发挥作用的体系有很多机会可以改进

一些利益相关者正在采取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消免犯罪记录，某些州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加紧支持取消针对幸存者的诉讼令。尽管联邦政府没有为幸存者提供消免其犯罪记录的法律途径，但在国会的几次会议上已经提出了立法。在金融领域，一些银行已经免除开设账户或信用卡的某些要求，从而使金融规划和服务更加容易获得。

然而，这只是建立对幸存者友好的体系的第一步。通过首次提供此类有关幸存者生计的数据，NSS为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提供了一个起点，以便开始采取更大、更有影响力的措施，改进美国的人口贩卖预防和应对工作。这一过程可作为在研究与幸存者建立真正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模式借鉴，而那些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推动政策进步的真正的专业人士。

附录

A: 受调查者的完整人口学概况

年龄、性别、跨性别、种族、情感、残疾

当前年龄	
18–25岁	11%
26–35岁	41%
36–45岁	28%
46–55岁	15%
55岁及以上	5%
受访人数	454

性别	
女性	86%
男性	7%
非二元/流性	6%
其他	1%
受访人数	453

跨性别	
是	5%
否	95%
受访人数	444

性别少数	
是	8%
否	92%
受访人数	453

性别	
无性恋	6%
双性恋	24%
流性	3%
男同性恋	2%
女同性恋	4%
其他	1%
泛性别	7%
酷儿	6%
探索中人群	3%
直人（异性恋）	60%
受访人数	439

性少数	
是	45%
否	55%
受访人数	439

种族/族裔	
白种人	57%
有色人种	43%
受访人数	448



族裔	
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7%
混血或多族裔者	11%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12%
东亚或东南亚裔	5%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15%
中东，北非或阿拉伯裔	2%
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1%
其他族裔	2%
南亚裔	1%
白人裔	66%
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居民	6%
受访人数	448

是否身患残疾	
是	59%
否	41%
受访人数	418

地区，籍贯，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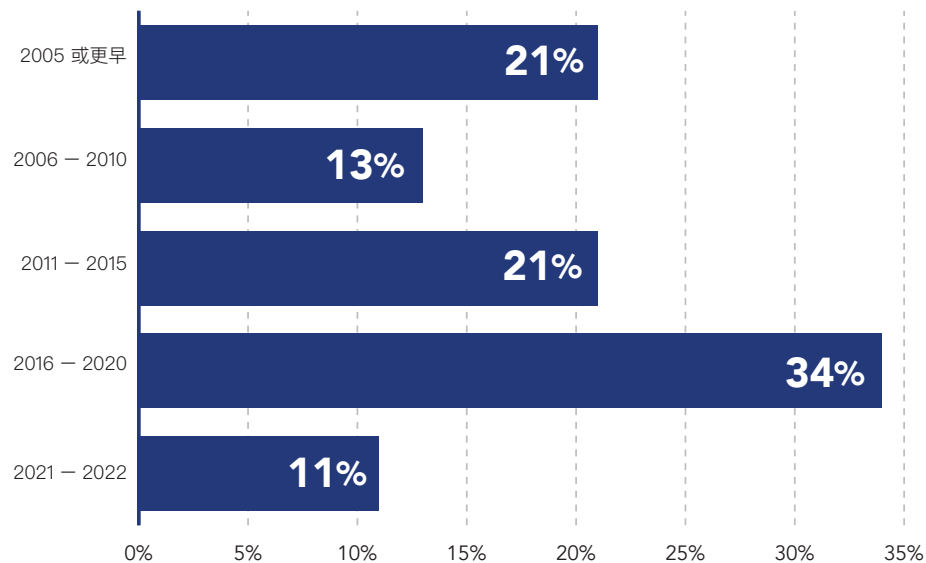
地区	
美国中西部	24%
美国东北部	12%
南部	36%
西部	28%
受访人数	441

最常与亲友使用的语言		
英语	93%	415
西班牙语	5%	24
汉语普通话	1%	4
其他	1%	4
受访人数	443	

居住区	
乡村	22%
城郊	40%
城市	38%
受访人数	396

遭受贩卖的时间、时长和类型

上次受剥削的时间 (N=443)



上次受剥削的经理距今多久 (N=443)



是否出生在美国以外、被强迫、欺骗或被别人强迫来美国	
是	37%
否	63%
受访人数	57



B: 性贩卖和劳工贩卖的调查定义

在调查中，以下问题被用来确定参与者的劳工贩卖或性贩卖的经历。

用于确定性贩卖幸存者身份的问题

请选择所有描述了你所经历的与性剥削相关的情况。（选择所有适用项）

- A. 在年满18岁以前，我不得不为了金钱、毒品、安居之所和/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进行性行为。
- B. 在年满18岁以前，我被迫、被人操纵或迫于压力进行性交易。
- C. 在年满18岁以前，某家庭成员曾强迫、操纵或施压而迫使我进行性交易。
- D. 成年后，我迫于压力、威胁、伤害或恐吓而进行性交易，以换取金钱、毒品、安居之所、法律文件和/或基本必需品。
- E. 我被要求把我进行性交易的所得欠款交给别人。
- F. 我住在一个我不想待的地方，同时为了钱、毒品、安居之所，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进行性交易。

[若选择了上述任何一项]
(选择所有适用项)

你所经历的任何一种性剥削是否涉及以下内容？

- G. 我无法保留我通过性行为赚的钱，无论多少。
- H. 我不得不通过性行为来偿还我欠的债。
- I. 我受到过威胁、伤害、恐吓，或害怕离开我被迫从事性行为的地方或状况。
- J. 我被迫从事过极长时间的性行为。
- K. 我被骗去从事性行为，而不是先前所承诺的工作。

用于确定劳工贩卖幸存者身份的问题

请从以下选项中选出描述了你被迫从事劳动或遭受剥削的、与性交易无关的经历。（选择所有适用项）

- A. 我不得不无偿工作，或者几乎没有报酬。
- B. 直到还清债务前，我不得不一直工作。
- C. 我被要求以很少的报酬工作，甚至是零报酬，以换取安居之所、法律文件和/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 D. 我在工作中曾受到威胁、伤害或恐吓，或者害怕离开我被迫工作的地方。
- E. 我的工资或所得钱款被人克扣，用来支付我的交通、食物、租金或工作所需的工具。
- F. 我被禁止离开我的工作场所，即使我想离开。
- G. 我被迫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报酬很少或没有报酬。
- H. 我被迫在不安全的环境中以很少报酬或没有报酬的方式工作，并被拒绝提供能够保护人身安全的防护装备或衣服。
- I. 为了阻止我离开我的工作场所，我的家人受到了威胁。
- J. 我被骗去做与先前承诺不符的工作，而且报酬很少或没有报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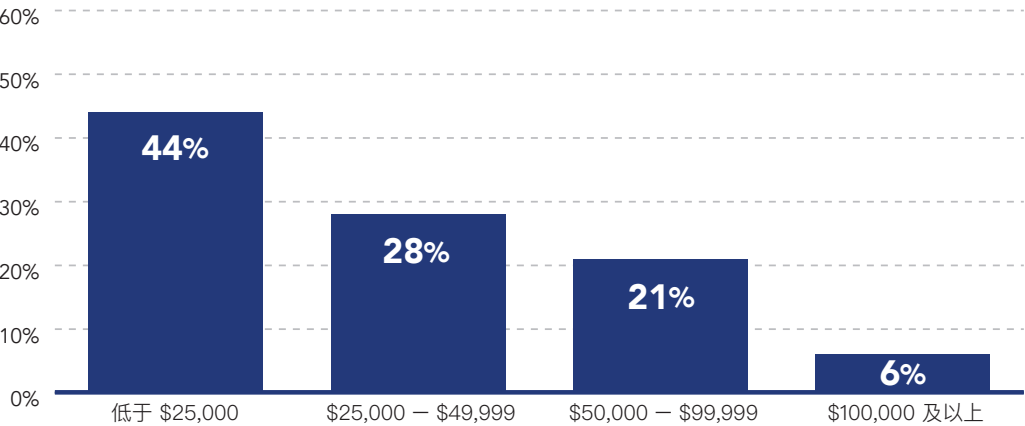


C: 不同幸存者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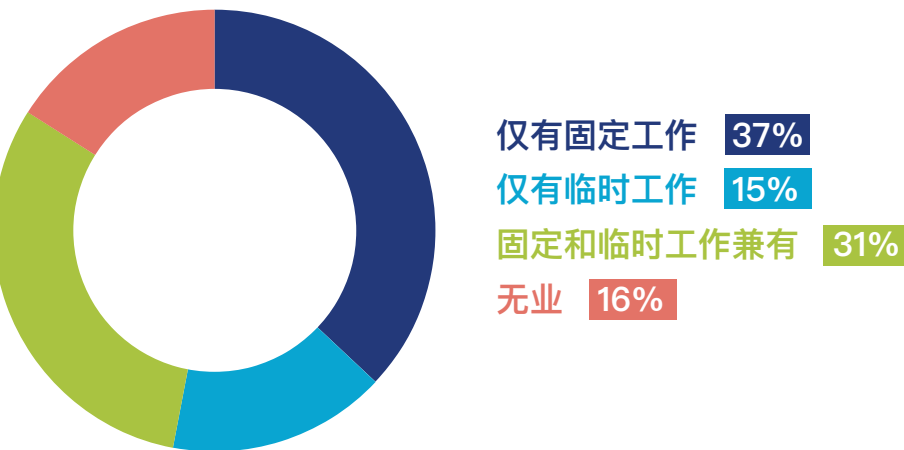
以下数据显示了不同人口统计数据就业和收入结果，对于各类社区的合作伙伴、支持组织，以及经历过各类剥削的幸存者来说，该结果可作为参考资料。

性贩卖受访者

性贩卖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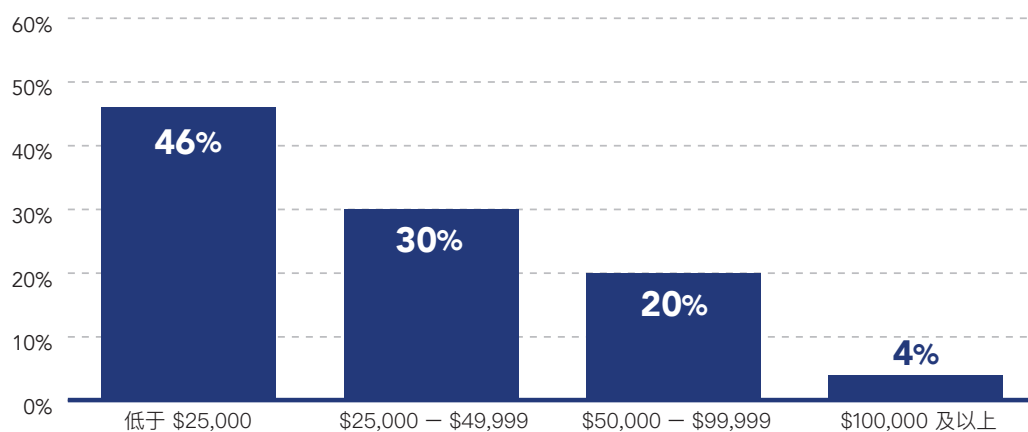


性贩卖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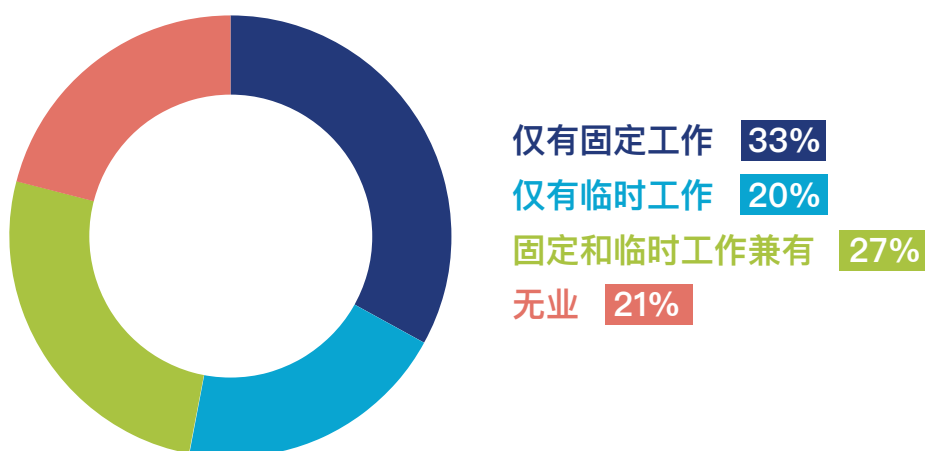


劳工贩卖受访者

劳动贩卖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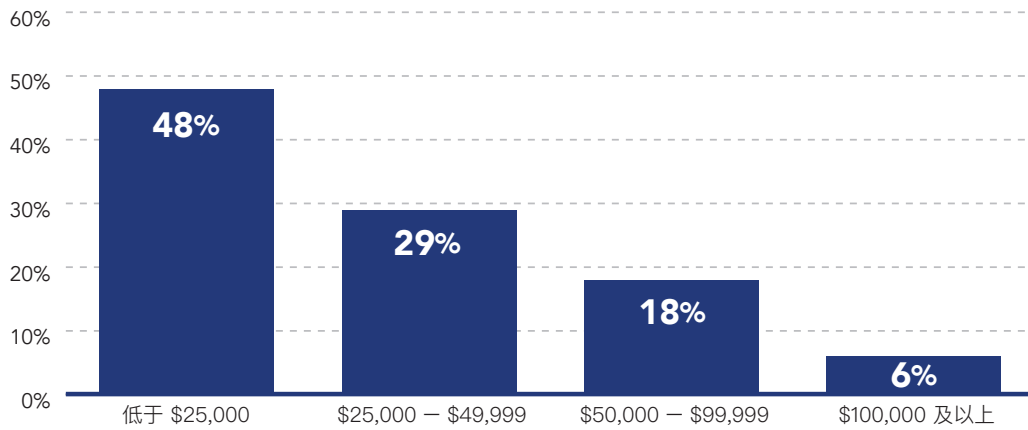
劳动贩卖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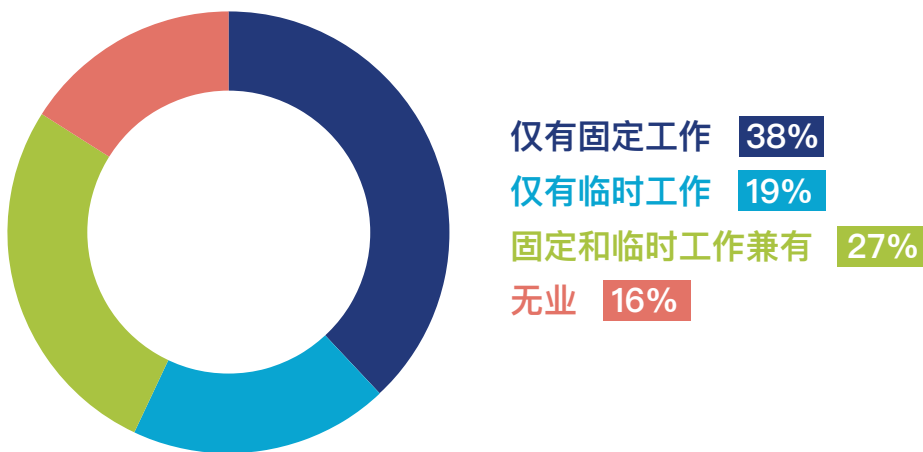


家庭性贩卖的受访者

家庭性贩卖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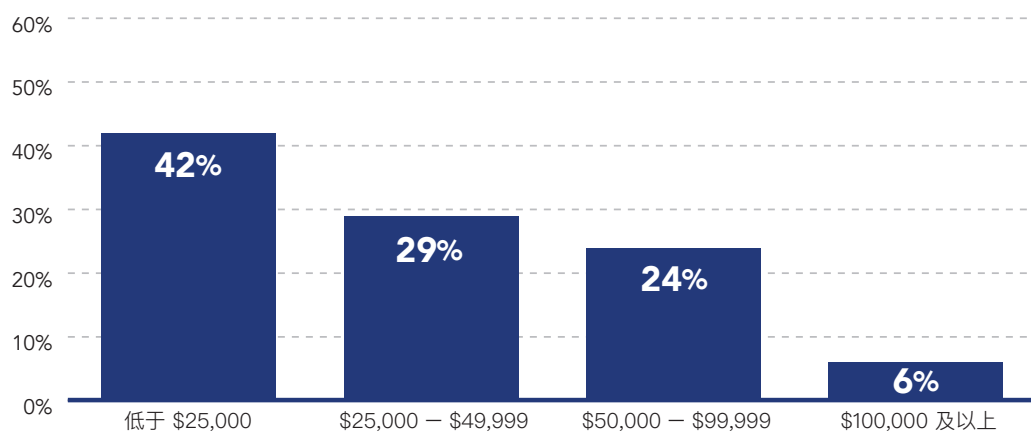


家庭性贩卖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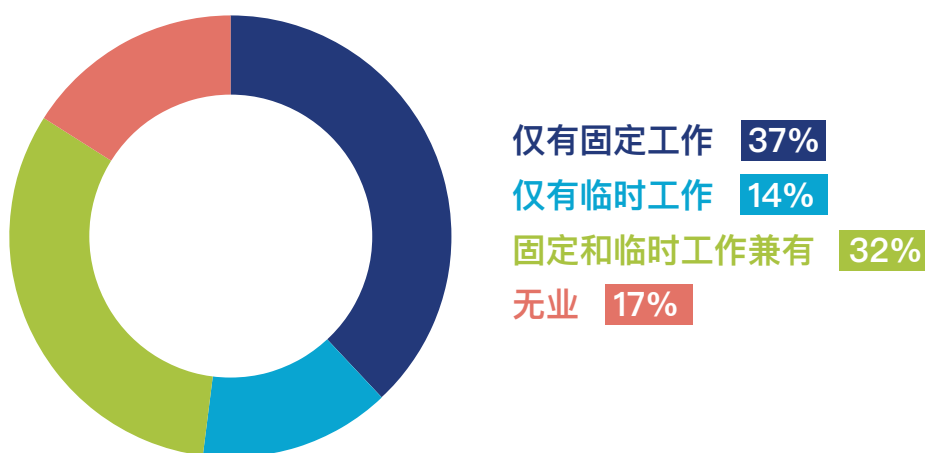


身份认同为白种人的受访者

白种人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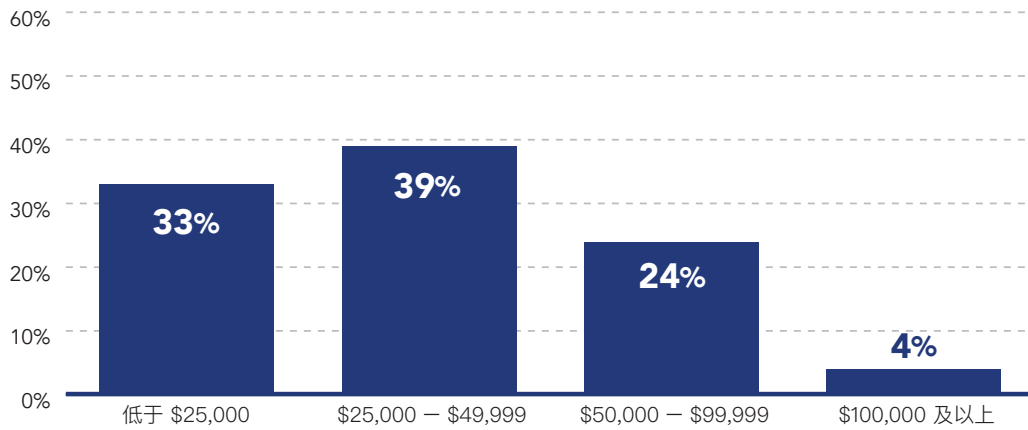
白种人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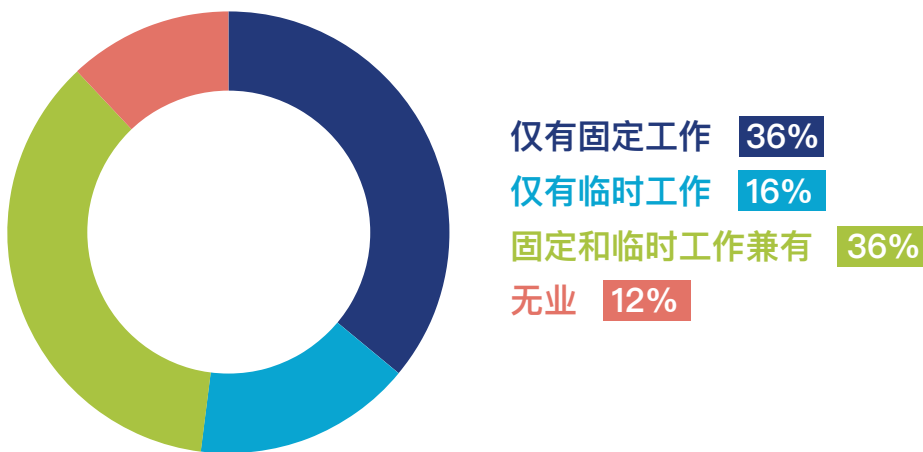


身份认同为黑人或非裔美国人的受访者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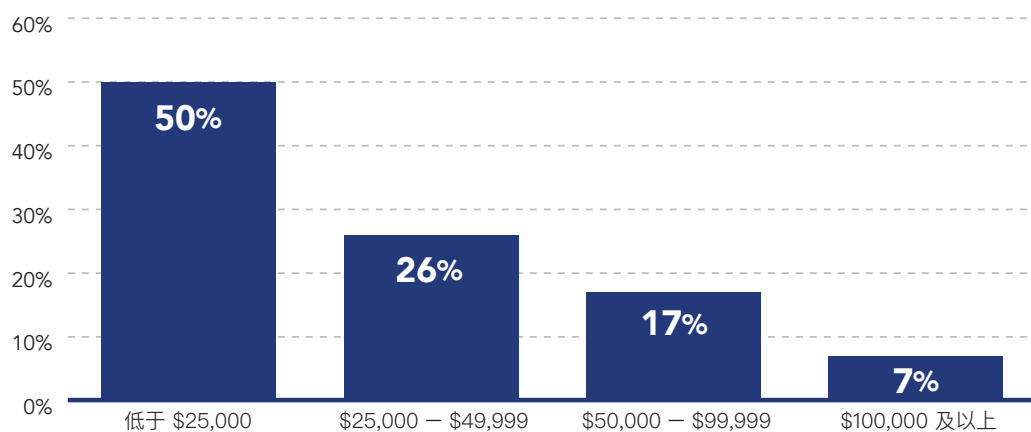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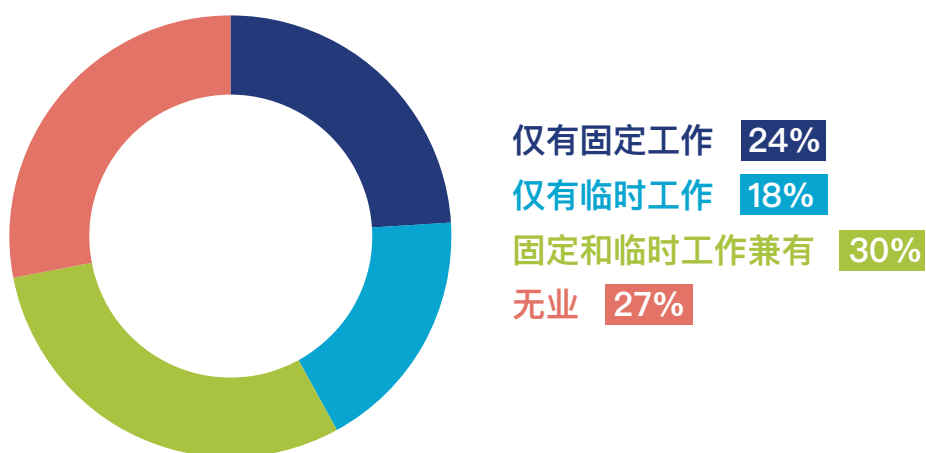


身份认同为西班牙裔或拉丁裔的受访者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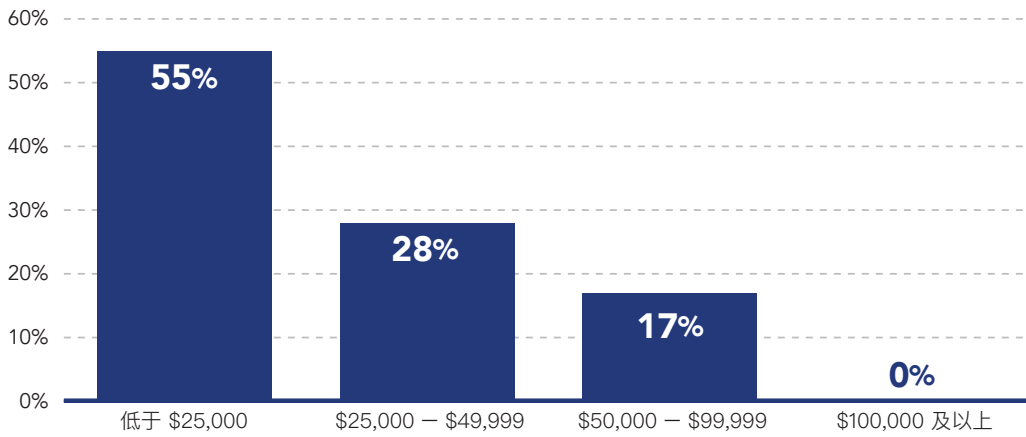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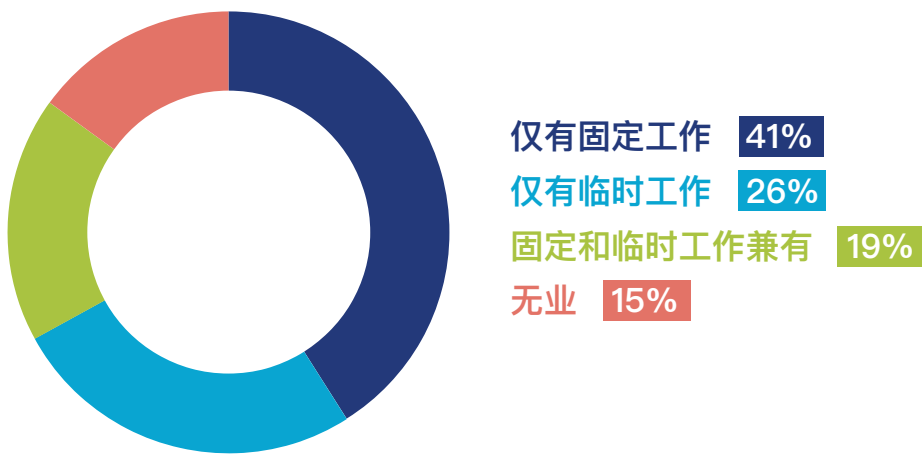


身份认同为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受访者

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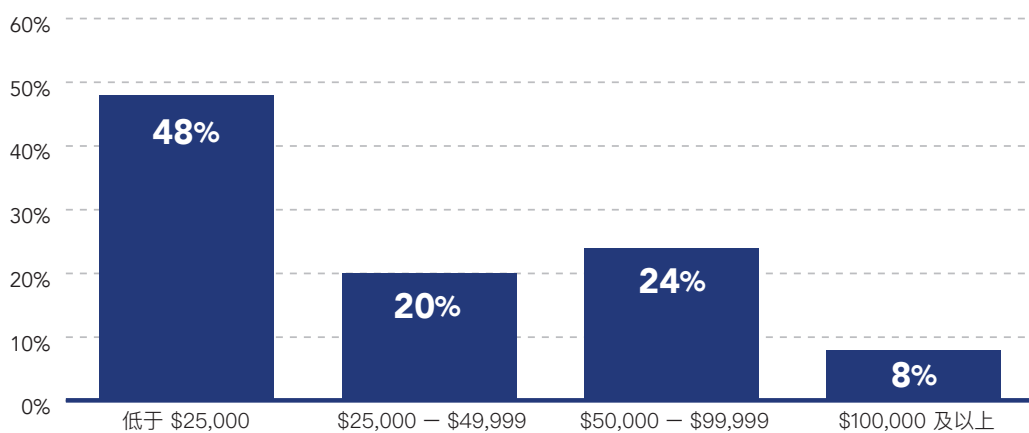


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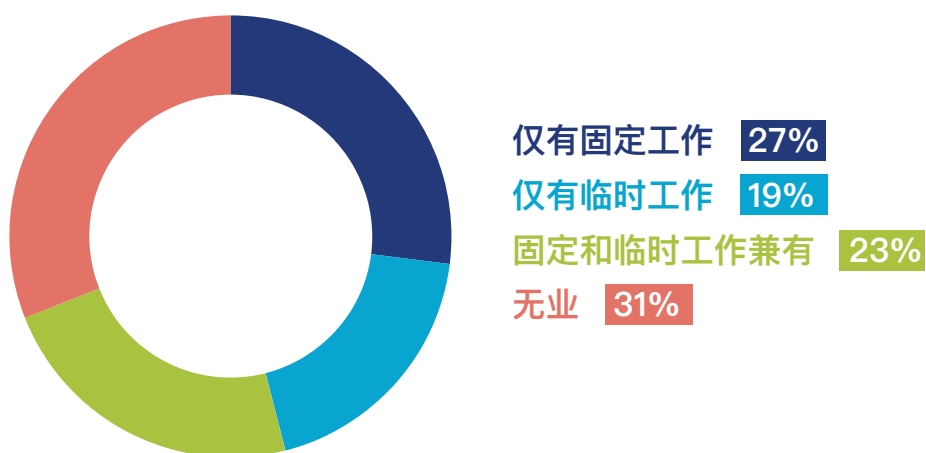


身份认同为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居民（AAPI）的受访者

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居民(AAPI)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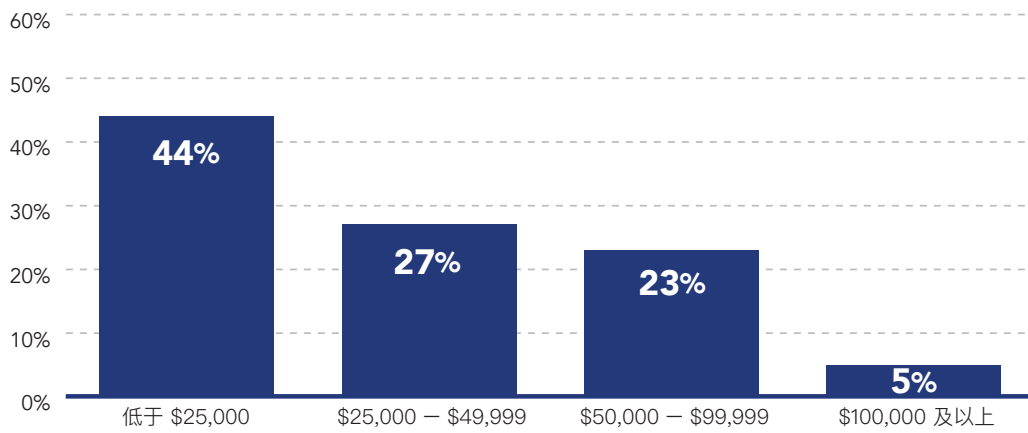
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居民(AAPI)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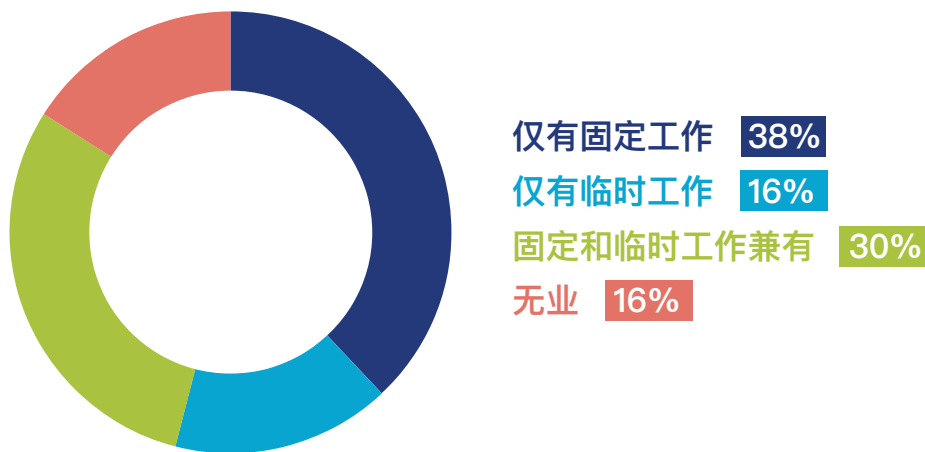


女性受访者

女性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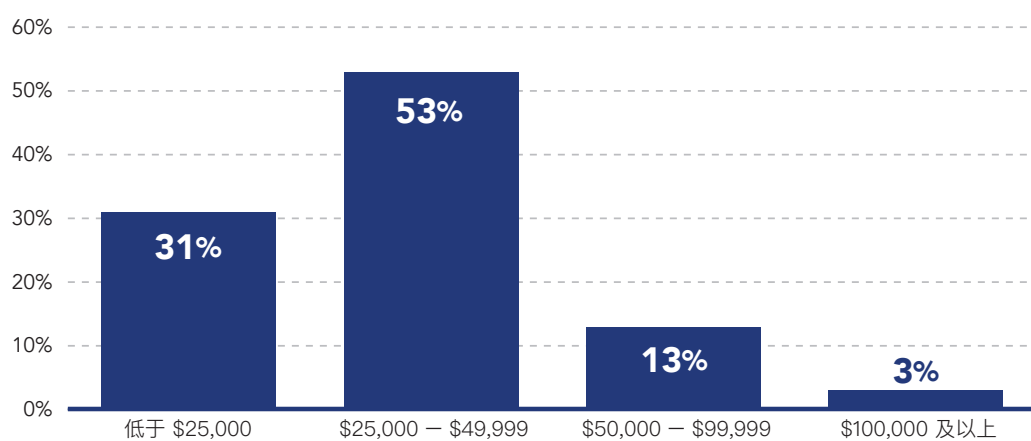


女性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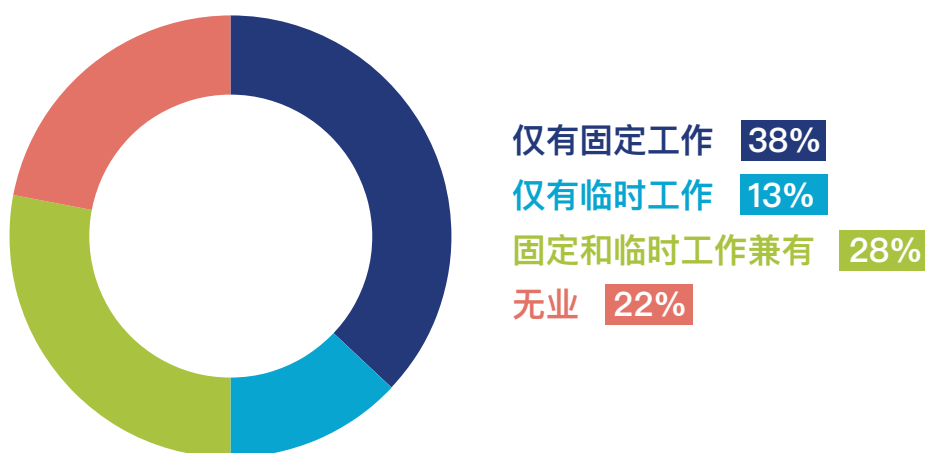


男性受访者

男性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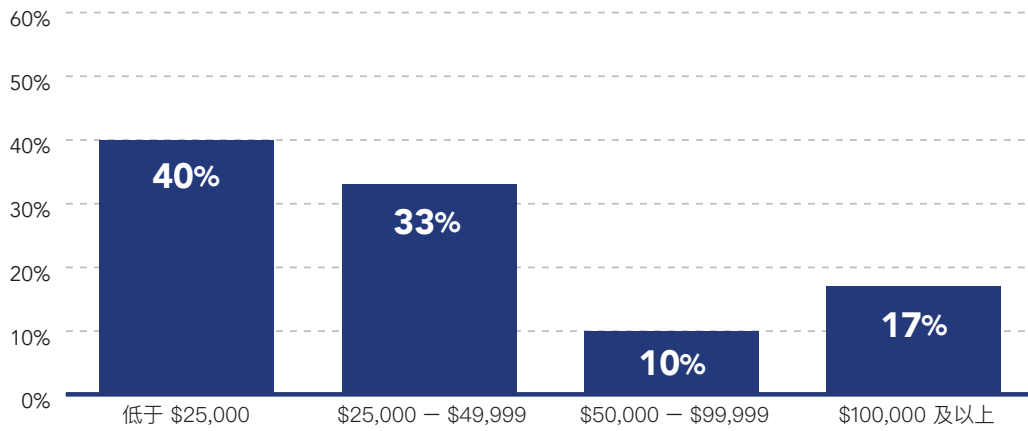
男性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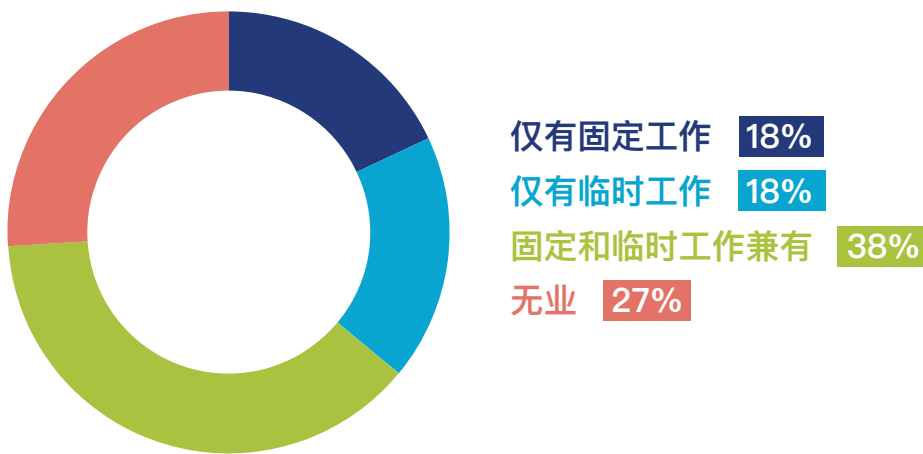


身份认同为性别少数的受访者

性别少数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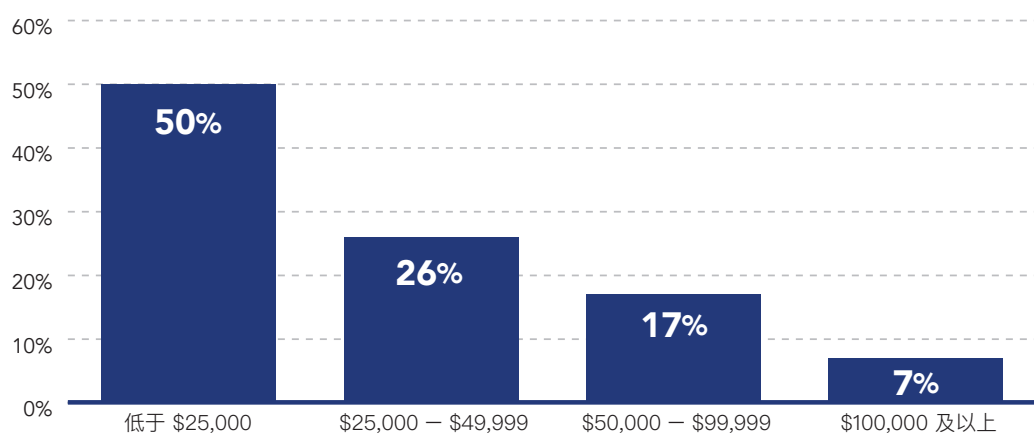


性别少数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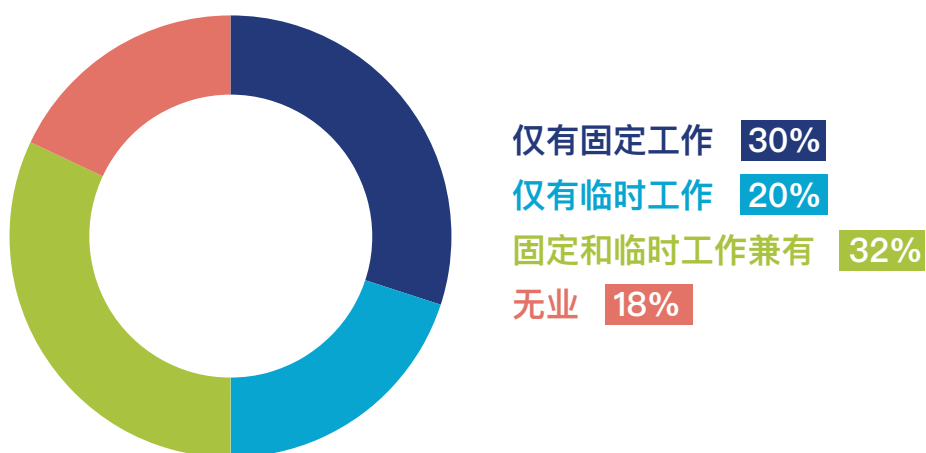


身份认同为性少数的受访者

性少数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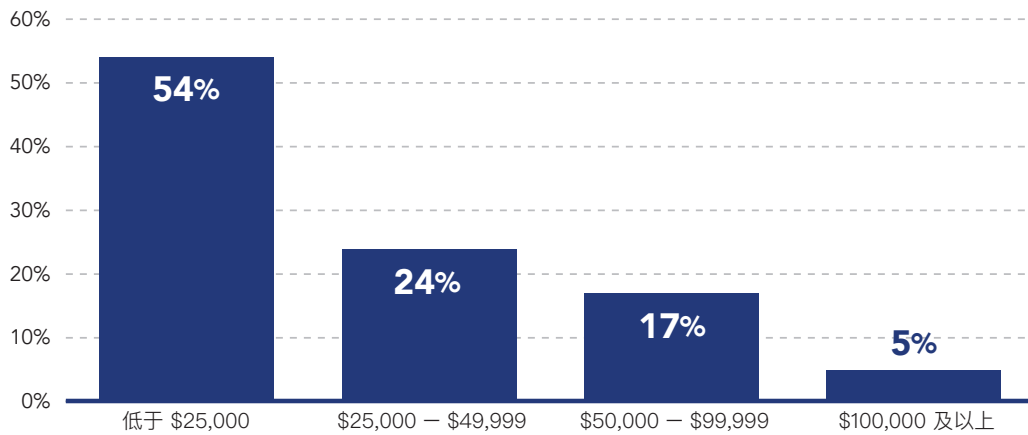
性少数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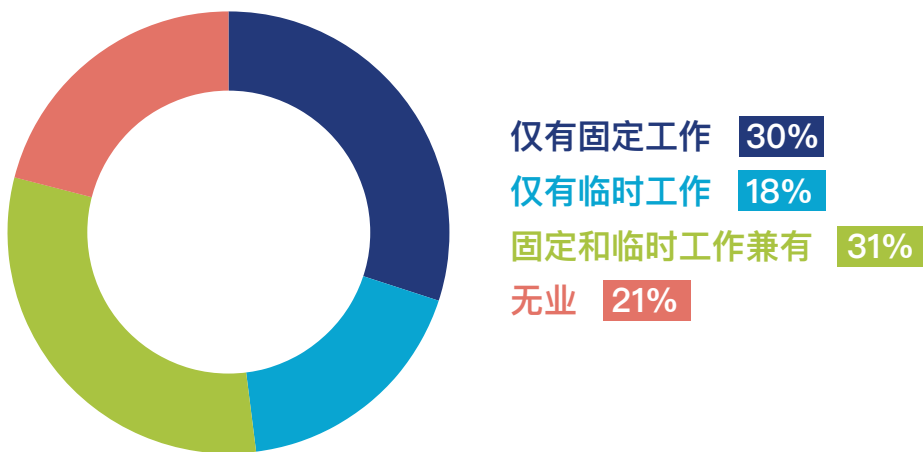


残疾人受访者

残疾人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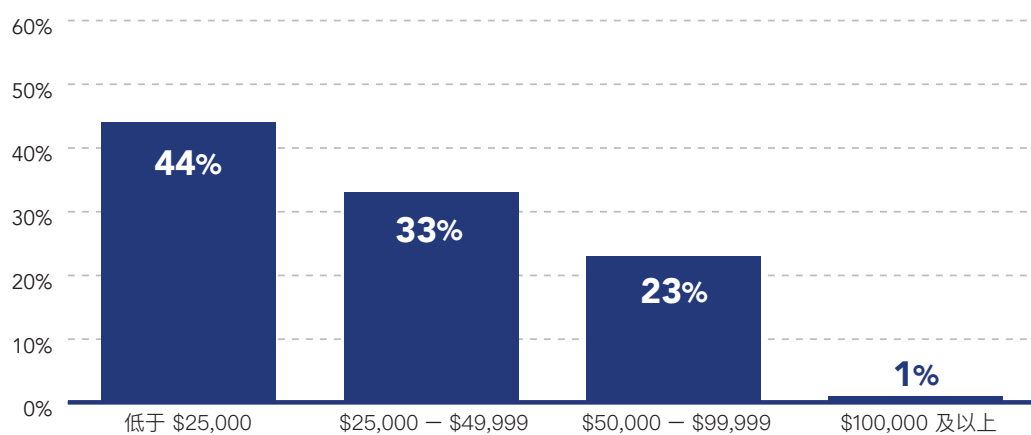


残疾人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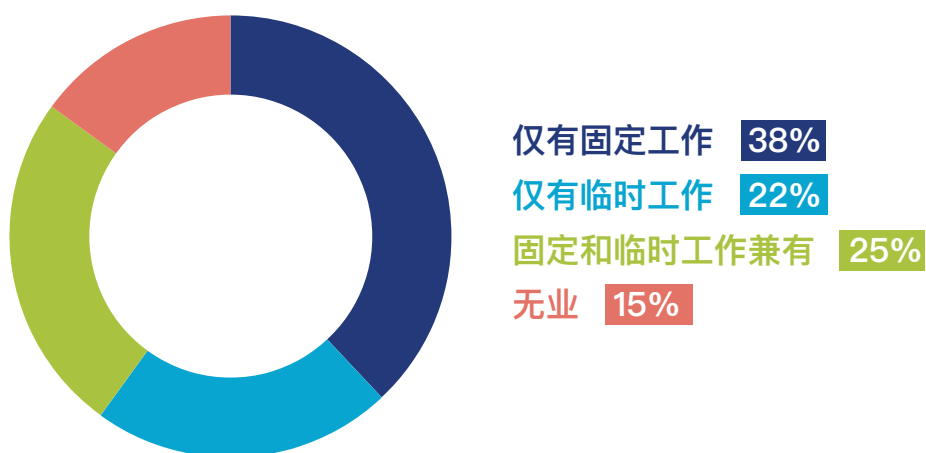


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受访者

乡村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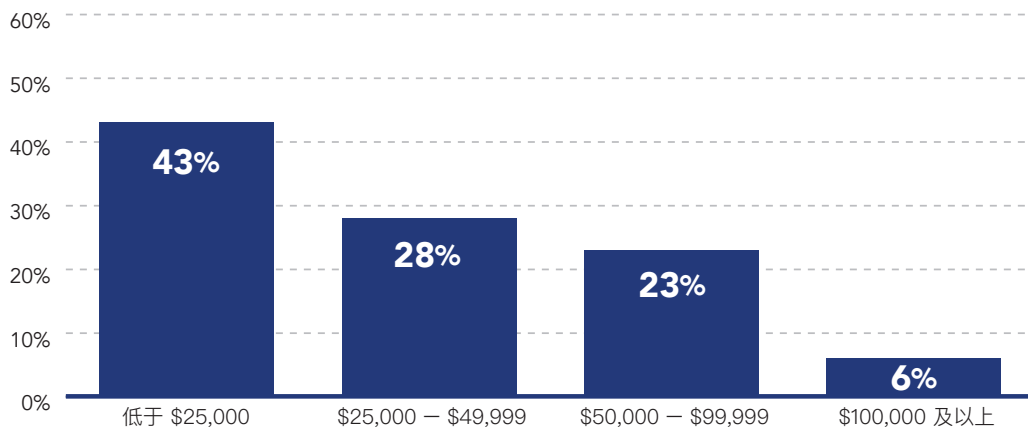
乡村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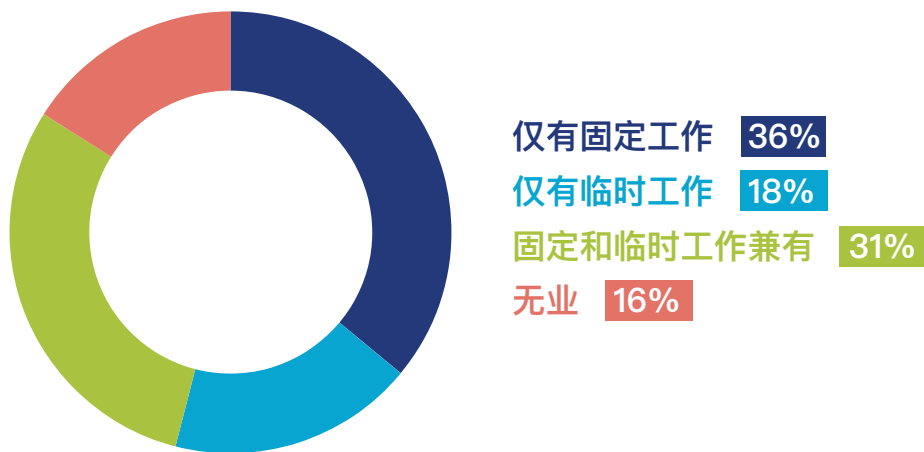


有家属的受访者

有家属的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 (N=211)



有家属的受访者的就业状况 (N=216)



研究贡献者致谢名单（内封底）

其他研究贡献者

除了长期致力于NSS的团队外，还有其他人士以多种方式为研究做出了贡献，包括通过分享他们的专家反馈和/或生活经验来协助研究和调查：

A'ishah H. Amatullah	Brittany Elizabeth Parish
Alia Dewees, Survivor Leader, Director of Aftercare Development	Brittney Rodas
Allyson Kitts	Caitlinn Carson
Alyssa Santana	Cal W
Amanda B.	Camille Briggs
Amanda Fangman	Carolyn Hoffman
Amber Hartman Ortez	Cassie Dandy
Amy Engle, LAMFT	Cat
Amy Lynn Andrews	Chanel Dionne
AmyLynn Harrington Smoot	Cheri Crider
Angela	Dr. Chelsea Taylor
Angela Rae Clark	Cherry Harrel
Angela Thorne	Chong Kim
Angelica	Chris Ash
Angie Conn	Chris Bates
Anna R.	Christine Cesa, MAICS
Anna Rivas	Christopher Mullally
Ansa Noreen	Christy Leigh
April Baker Lived 生活经历专家	Cindy
Arien Pauls-Garcia	CJ Strong
Arthi Sachdev	Cristian Eduardo
Ashley Maha'a	Dafne Burciaga
Athena Edwards	Dana Baldukas, MBA
Aubree E. 幸存者支持者, LEE	Danett Williams
Autumn McCraw	Daniel C
Beautiful Feet	Debbie Hickson
	Diana Burke



Dianna	Karisah Kutta
Dominique Buffett	Karla Solomon
Dr. Elizabeth Bowman, LICSW, LCSW-C	Dr. Katariina Rosenblatt
Elizabeth (Lisa) Christo	Katelyn Lynch
Ella Gustin	Kathleen Niestadt
Felicia	Kathy Givens
Frank M. Afflitto, Ph.D.	Katie Feiler, MSW, LSW
Fun \$ize	Katie Papke, LMSW 幸存者领袖
Dr. Gregory Williams	Keyana Marshall Wheatley
Gwendolyn Jones	Kiki Riga
Hannah Blair	Kimba Green
Hannum S. O'Reilly	Kristin Vaughn
Hazel Fasthorse	Kristina Glackin
Heather Charlene Smith	Laura Mullen,人口贩卖幸存者顾问委员会联合创始人兼主席
Helen Leung	Laurin Crosson
Helen S	Leanna K
Hollisha Hale	Lex Reyes
Holly Rivera	Lily Rivera
Izeda Lachica	Lisa Glass
Jamie Rosseland	Liz Williamson
Jane Doe	Lorena Jayne Profit-Spencer
Jennifer Roeder – 幸存者支持者	Lydia Davis
Jeri Jimenez	Makayla Gohn
Jessa Dillow Crisp, MA, NCC, LPCC	Marley
Jessica Kay, LMSW	Mary Landerholm
Jessica M. Contreras	Megan E. Sawchuk
Jessica Y. Johnson	Megan Lundstrom, The Avery Center 公司CEO兼联合创始人
John Price	Megan Malone
Jolene Hollis	Megan Reinikka
Jordan Dewar	Melissa Smith
Joy Friedman	Michael George Andrade Jr.
Julie Johnson	Miranda
Kalila Riga	MJ
Karen O	

Molly C. Sheahan	“Sam” AKG Phillips
Molly Cruz, CPRSS, QBHS	Sara Inglett
Morgan Tingwall	Sarah Britton
Myshel McKerrow	Sarah Zalonis
Nakia Vestal	Sarita Callender
Natalie Parker	Sean M. Wheeler
Nicole Rose Lundgren	Shannon Jones
Nikki Doyle	Shelby M. Thompson 幸存者领袖
Dr. Nissi Hamilton	Shelia Simpkins
NiNa	Stacey King
NSL	Stephanie Anderson
Nykki Canete, MSW, LSWAA	T. Harris
Patty Bennett	T.C. Justine Baker
Penelope Duncan	Tajuan McCarty, 幸存者/支持者
Phylicia King	Tamara
Poppy Jean Romero	Taneeisha Hammett
Prizila Vidal	Tanya Thomas
Rachael Asbey	Taushia Chacon
Rachel S. Niemiec	Taylor Venezuela
Rafael Flores	Toni McKinley, LPC, 作家, 幸存者领袖,
Raquel Piscopo	Tricia A. Grant
Rebecca Bender	Ursel Hughes
Rebecca Lynn Swindle	Valéria M. Souza, Ph.D.
Rebekah Bailey	Valerie Addy
Ria Story	Wang Fen
Rita O’Brien, LLMSW	Willow Grey
Robin Levasseur	
Sable Horton-Coleman	





@polaris_project



@polarisproject



/polarisproject